

# 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 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

許雪姬\*\*

## 摘 要

「滿洲國」是日本於 1932 年在中國東北泡製的傀儡政權，前後共 14 年。由於臺灣知識分子，在臺出路不好，又受差別待遇，而一個新興國家建立，需要各種人才；再加上滿洲國待遇好，且無歧視問題，因此成為大學甫畢業者嚮往的工作地域。大同學院創立於 1932 年 7 月，是養成中間官吏的訓練所，透過考試錄取人才，加以 6 個月到 1 年的訓練，即可躋身高等官之列，是成為滿洲國官員的終南捷徑。1938 年發布「文官令」，高等考試及格者仍須入大同學院受訓，可見大同學院的重要性。臺灣當時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臺灣人既通曉日文，漢文能力又比日本人強，學北京話也快，故臺灣人才也是被延攬的對象。最先考上的是畢業自臺北帝大的陳錫卿、黃清塗及 1 名在臺日人，以後一直到 1945 年，臺灣人在大同學院受訓練的共有 29 人，大半取得高等官的資格，以行政官為多、司法官其次，技術官、教官較少。戰後除了 1 名亡故，2 人留在東北外，都回到臺灣，雖然政府不承認他們公務員的資格和年資，但憑著「滿洲經驗」和實力，仍在戰後的臺灣有其一席之地。由於過去學界，僅重視在重慶臺人的抗日組織，以致這批政治不正確的菁英，遮掩其在「偽滿」的經驗；加上史料相對較少，一向較少受到關注與研究。

本文利用《滿洲國政府公報》、〈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1942、1998）及《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等相關史料，先探討大同學院的設置、滿洲國文官令頒布後，大同學院角色的轉換，並介紹大同學院畢業的臺灣人，其到滿洲國的原因，及其經歷與戰後回臺的肆應，以見證這段臺灣人中較為特殊的經驗。

關鍵詞：大同學院、「滿洲國」、臺灣人

---

\* 本文曾於 2011 年 11 月 6 日在「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工作坊發表，承吳文星教授指正，謹致謝意。又本文完成得力於陳雅苓、李安瑜、藍瑩如、蔡函縈四位助理的協助。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2 年 4 月 2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7 月 16 日。

- 一、前言
- 二、大同學院的設立
- 三、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與大同學院
- 四、畢業於大同學院的臺灣人
- 五、結論

---

## 一、前言

有關「滿洲國」<sup>1</sup>（1932-1945）的研究，日本人以滿洲國史為中心展開，有站在辯護、有站在批判的角度，其中最典型的是為日本侵占滿洲辯護的書，如由滿洲國國史編纂刊行會編寫的《滿洲國史》（包括總論、各論）；<sup>2</sup> 中國方面則研究「偽滿洲國史」，由強烈批判日本的侵略行為展開，其著作如汗牛充棟，較著名的有姜念東的《偽滿洲國史》、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sup>3</sup> 其基調將這時期稱為淪陷十四年史。至於中、日兩國分由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纂委員會<sup>4</sup> 和日本社會文學會（2001年10月由殖民地文化研究會改稱）共同研究，而在2010年分

---

<sup>1</sup> 「滿洲國」是眾所周知的傀儡政權，本文除題目外，不再將滿洲國加「」，而文中的「滿洲國」有時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又戰後則一律改稱中國東北或東北。

<sup>2</sup>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上卷·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下卷·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1990年在長春的「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將之翻譯出版。本書的總字數有170萬字，寫作、出版團隊有140多人。這部書肯定了日本人在滿洲國的奮鬥和業績，且包含面廣，因此被視為是「日本戰後出版的數以百計的有關滿洲國著述中，內容較為龐雜、部頭較大，政治色彩濃厚的綜合性代表著作之一。」參見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上冊》（長春：該組，1990），頁1，〈《滿洲國史：分論》中譯本序言〉。在此書之出版前，還有「東北淪陷十四年史遼寧編寫組」翻譯滿史會編的《滿洲開發四十年史》（遼寧：該組，1988）。

<sup>3</sup> 姜念東，《偽滿洲國史》（大連：大連出版社，1991）；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sup>4</sup> 此組織是在中國重新認識歷史的運動中，於1986年10月由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出資成立的機構，其目的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長達14年的侵略和統治以及中國民眾的反滿抗日運動進行綜合的調查研究，並將其成果出版。前述《滿洲國史》的翻譯，正是這個組織的業績之一。

別用中、日文出版的《偽滿洲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據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會長西田勝所寫的序中說，這本書是由加害方與受害方通過多年的討論與研究，第一次出版的共同歷史認識的成果，這雖說是劃時代且意義深遠的，但兩方對「滿洲國」認識並非完全一致。<sup>5</sup> 這本書的最後有中、日兩國對「滿洲國」歷史研究的現狀，值得參考。在滿洲國的相關研究中，唯一提到在滿洲的臺灣人，是山室信一的研究。他在討論由日本統治區流入的人才時，有專節介紹由臺灣到滿洲的人才。<sup>6</sup> 但其取材，大半依據筆者相關的口述歷史成果。

在臺灣，研究東北的不乏其人，但研究「滿洲國」的人不多，其中有一位丘樹屏（廣東蕉嶺）曾寫了一部《偽滿洲國十四年史話》，中國方面稱他是臺灣地理歷史學者，但該書並非學術著作；另有一位蔡雅祺，著《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一書。<sup>7</sup> 筆者十多年前開始進行臺灣人與滿洲國之間的研究，由口述歷史慢慢做起，一直到今天，也還在摸索的過程中，<sup>8</sup> 主要是可用的資料十分有限。日治時期有關臺灣和滿洲之間的史料，只有幾本書可以參考，如黃竹堂《新興滿洲國見聞記》、赤木猛市《滿洲國と臺灣》、加納久夫《臺灣から滿洲へ》、石山賢吉《紀行滿洲、臺灣、海南島》，<sup>9</sup> 或者是臺灣總督府財

<sup>5</sup>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編，《偽滿洲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本書為作者之一李茂杰先生所贈，謹致謝意。

<sup>6</sup> 山室信一，〈植民帝國・日本の構成と滿洲國：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收於ピーター・ドウズ（Peter Duus）、小林英夫編，《帝國という幻想：「大東亞共榮圈」の思想と現実》（東京：青木書店，1998），頁181-184。

<sup>7</sup> 丘樹屏，《偽滿洲國十四年史話》（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1998）。本書共577頁，書中的尾章〈偽滿洲國時期重要人物〉，謝介石列入第一部分偽滿初期國務院首任人物。本書未曾註解，故視為一般性刊物；蔡雅祺，《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臺北：國史館，2010）。此書未特別提到臺灣人。

<sup>8</sup> 六年前已完成「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菁英」一書草稿，但一直不滿意其中還有的空隙，在未補足之前難以出版。

<sup>9</sup> 黃竹堂這本書是其自己到滿洲旅行的見聞，於1933年出版，黃在5月到滿洲國訪問一個月，主要目的是向臺灣人報導滿洲的種種，和臺灣人在滿洲的情形，尤其當時任滿洲國外交部總長的謝介石其所住的謝公館。這本書分成三部分，一是旅行日記，一是滿洲諸事情，一是附錄。黃原本還要到吉林、哈爾濱，卻因兒子生病，乃由新京轉回臺灣。赤木猛市《滿洲國と臺灣》，主要談滿洲國和臺灣之間的關係，由臺北市役所於1933年發行。臺北市物產展示會在1933年8月起自臺北出發巡迴於滿洲國幾個大城市開展示會，8月30日結束行程後，赤木再到各地去了解情況，加上取得的導覽小冊子做為資料，將滿洲國與日本，特別是與臺灣間的關係，加以敘述。加納久夫《臺灣から滿洲へ》一書，出版於1932年，是以臺灣與滿洲做比較的書，並以新聞記者的報導方式來介紹滿洲。這時剛好是滿洲國剛建國的時候，加納拿臺北和大連的建築做比較，又介紹撫順說是和臺灣關係最深的都市，特別有一節談到滿洲國建國當取範日本之統治臺灣，又介紹謝介石、陳天來等人在滿洲的情況。石山賢吉的紀行，出版

務局稅務課編《臺灣對南支南洋貿易表（附錄：中支、北支、滿洲國、關東州）》等；偶而由滿洲國相關書中談到臺灣人者，也只是片鱗而已。<sup>10</sup> 然而要研究戰後的臺灣，不能不了解戰前臺灣人的海外活動，這其中較為特殊的是在滿洲的臺灣人官僚，這些官僚有一部分畢業自大同學院，故本文擬先探討做為滿洲國高等官搖籃的大同學院。它創立於1932年，1938年文官令公布後，大同學院的角色有何改變？臺灣人何以到滿洲，並進入大同學院？這些就學大同學院的臺灣人、朝鮮人、日本人、中國人的比例為何？臺灣人在大同學院畢業後的經歷又如何？滿洲國滅亡後，他們選擇回到臺灣的居多，此後的境遇如何？這些都是本文擬探討的問題。

有關大同學院中的臺灣人這一主題，過去從未有人研究過，沒有先行研究可以參考。本主題的相關史料最重要的是《滿洲國政府公報》（分上、下欄，分別為中文、日文）；<sup>11</sup> 大同學院同窓會所編的《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1942、1998）、<sup>12</sup> 《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1986）。<sup>13</sup> 其他如滿洲國國務院文教部總務司出版的《滿洲帝國文教關係職員錄》（1936），<sup>14</sup> 以及《滿華職員錄》（1942），<sup>15</sup> 亦為重要參考資料。另日本之林ひふみ撰寫滿洲國後期在吉林師道大學任教，戰後留在中國從事音樂工作的董清財，<sup>16</sup> 值得參考。

---

在1942年，比前幾本書的出版都來得晚。這是石山分二次，進行不到3個月旅行的旅行記，先是去朝鮮、滿洲，翌年到臺灣、沖繩、海南島。在臺時還曾訪問臺灣總督長谷川清，石山對臺灣的觀察在工業、農業方面，對滿洲國也是以報導工業，尤其是著眼於水力發電為主，兩地的報導，可由讀者加以比較。

<sup>10</sup> 如：渡辺諒，《大いなる流れ：滿洲終戦実記》（東京：大いなる流れ刊行会，1956）。在第二十七章有「臺灣人」一章，也不過3頁（頁111-113）。

<sup>11</sup> 《滿洲國政府公報》第1號發行於1932年4月1日，到第341號止。康德改元後，又自1號開始。因此只寫號時，必須說明是大同還是康德。此公報原以中文為主，而後有日譯本，大概晚中文版1個半月發行，到1933年9月，大同152號起，中文、日譯同日發行。到1936年，將中、日文合體，每頁分二部分，上部為中文，下部為日文。（古屋哲夫編，《滿洲国人事法今年表：大同元年（1932）～康德二年（1935）》（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頁117-119。

<sup>12</sup> 大同學院同窓會編，《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東京：該會，1942）；米沢久子編集，《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東京：大同学院同窓会，1998）。

<sup>13</sup> 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東京：大同学院同窓会，1986）。本書承陳許碧梧女士借閱，僅致謝意。當初由同窓會編這書時，曾依「中華民國大同學院同學會名單」寄出31封邀稿函給臺籍生（也包括自東北來臺者），但當時臺灣在政治上尚未解嚴，沒有一個人響應這個活動，至為可惜。而中國有22人、韓國有4人寫出對大同學院的回憶，參見本書的〈編集後記〉，頁203-204。而之前大同學院同窓會於1966年曾出版《大いなる哉滿洲》，惟筆者未見過此書。

<sup>14</sup> 滿洲國國務院文教部總務司編，《滿洲帝國文教關係職員錄》（新京：該司，1936）。

<sup>15</sup> 中西利八編纂，《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2）。

<sup>16</sup> 林ひふみ，〈滿洲国の台湾人と日本人，その戦後董清財，吉崎ヨシ夫妻の足跡〉，《明治大学教養論集》441（2009年1月），頁1-38。

除了以上出版品外，口述史資料也必須重視。筆者十多年前訪談過陳亭卿、蔡西坤、謝報、林永倉、李水清、徐水德等幾個畢業於大同學院者，亦訪問過黃清塗夫人黃陳波雲、陳錫卿夫人陳許碧梧，他們隨夫前往「滿洲國」；後者還參加了第一部第二期學生的報到與赴「滿洲國」的行程，分別收錄在《口述歷史（第5期）》、《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兩書。<sup>17</sup> 這些訪談的資料對了解大同學院極有幫助。

## 二、大同學院的設立

### （一）「滿洲國」官吏中的日系官吏

臺灣人之所以能在滿洲國當官，和滿洲國所謂日系官吏所占的比例有關，茲簡述如下：據滿洲國執政、皇帝溥儀被捕後的筆供（用筆寫下來的供詞）稱，當滿洲國建國時，日方曾堅持在滿洲國的官員中，日系要占三成，往後在財政部總長熙洽<sup>18</sup>等人反對下，因而大致是1比4，但關東軍司令本庄繁有權對於日系官員加以晉用、免職。<sup>19</sup> 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政府任用了600名官員，其中日系占二成為原則，為了維持以滿洲官員（漢人＋滿人）為主的假象，日系官員只在國務院總務廳廳長、各處處長、各部總務司長、各省總務廳長下，做為各部總長、各省長的輔佐。表面上滿洲人任高官，實際上的主導權卻掌握在日系官員手中，<sup>20</sup>

<sup>17</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該所，1994）；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二版一刷）。

<sup>18</sup> 熙洽，滿洲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任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兼任吉林省長，屬復辟派。他主張「滿洲應該掌握在滿洲人手中」。在滿洲國建立後任鄭孝胥內閣的財政部總長，在張景惠內閣任宮內府大臣。參見今村俊三等，《滿洲國人傑紹介號》（東京：日支問題研究會，1935），頁9。

<sup>19</sup> 〈愛新覺羅·溥儀筆供〉，收於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2-14。不只本庄繁，只要是關東軍司令官，不受日本政府的指揮，直屬天皇，他是天皇派來指導滿洲皇帝的師傅，因此日系官吏的總務長官要接受關東軍司令的內面指導，而滿洲國政府不直接和日本聯絡，而是透過關東軍司令部通往日本陸軍省軍務局，此局再經由對滿事務局（以後的大東亞省），到達日本政府。參見武藤富男，《私と滿洲国》（東京：文芸春秋，1988），頁100。

<sup>20</sup>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下卷·各論》，頁1089。

至於政府的政策並非由滿洲人的國務院總理下決定，而是由總務廳長（總務長官）主持的火曜會<sup>21</sup>中做成。一旦案件通過，即使國務院、參議府、溥儀都不得變更。因此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滿洲國實際上的「統治者」。<sup>22</sup>舉例來說，第一任國務總理鄭孝胥即因總務廳長駒井德三的專橫，而對諸事保持沈默，並因而於1935年5月去職。<sup>23</sup>原則上日系官吏占二成，但實際執行如何？在總務廳、國都建設局是日人占七成，財政部、實業部是占六成，民政部是占三成，至於地方公署則是占二成，至於省、縣、旗則大半是滿系官吏。<sup>24</sup>之所以未能謹守1比4的比例，主要有兩個原因：

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的行政權1936年交由滿洲國來執行，因而政府必須吸收在職大量的日系職員。

2. 基於需要熟於產業開發、開拓政策、戰時行政、技術部門人員，而滿洲較少這類人才。

為了增加合格的行政官僚，1938年發布文官令，以採用考試、適格考試來增加官員人數，由於考試科目需用日語作答，因此考取者中十個有七個是日系，升等的登格考試，也是七三比例。<sup>25</sup>《滿洲國史》雖一再強調日本人到滿洲國崩潰前仍然嚴守着「日系官員」二成的規範，<sup>26</sup>非但不是事實，<sup>27</sup>且有決定權的都是日系，等於日本人掌握滿洲國的一切行政體系，談不上日滿共治，更不用說五族協和了。<sup>28</sup>

<sup>21</sup> 參加者有總務廳長（後改為總務長官）、總務廳次長、各部次長、總務廳各處長、興安總局參與官、總務廳文書科長，還有代表軍部的人參加，稱作次長會議，因在星期二召開，因此又叫火曜會。1937年以後改在星期三開，改叫水曜會。見王賢津，〈偽滿：日本的掌中物〉，收於文斐編，《我所知道的偽滿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頁93-94。

<sup>22</sup> 〈臧式毅筆供〉，收於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頁96。

<sup>23</sup> 林聲主編，《九一八事變圖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206；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冊，〈整理說明〉，不著頁數。

<sup>24</sup>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上冊》，頁34-35。

<sup>25</sup> 〈谷次亨筆供〉，收於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頁163-164。谷次亨曾任滿洲國民政部警務處外事科長。參見舉國社編，《大滿洲帝國名鑑》（東京：該社，1934），頁86。

<sup>26</sup>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下卷·各論》，頁34。如表二所述，日系比例更高。

<sup>27</sup> 林聲主編，《九一八事變圖志》，頁206。林聲指出滿洲建國之初，日系官吏已占了三成。

<sup>28</sup> 所謂五族協和是指漢、滿、蒙、日、鮮互相協助。但在滿洲的朝鮮人則戲謔地解釋為是在民族差別之下，協助大和民族侵略中國。參見尹虎，〈「滿洲國」における在滿朝鮮人指導方針と「民族協和」〉，《國際日本學論叢》6（2009年3月），頁57。

臺灣人在 1897 年 5 月 8 日「臺灣住民去就決定日」之後未離開臺灣的，實際已成了日本籍，因此臺灣人在滿洲任官也算是占日系官員的名額；但有例外亦必須說明，如由放棄日本籍改入中華民國籍，甚至滿洲民籍者，即佔滿系缺，如謝介石在 1914 年改為中華民國籍；<sup>29</sup> 亦有臺灣人為滿洲民籍，如王世恭（王洛）醫師，1929 年 5 月登錄為醫師時，籍貫為奉天省瀋陽縣。<sup>30</sup> 有此了解，對於大同學院第二部原以招收滿系人學生為主，卻有日系臺籍人士出現的事便不覺得唐突。

## （二）大同學院的建立與分期

大同學院可分前、中、後期，是日本代滿洲國訓練高級幹部的地方，<sup>31</sup> 曾就讀大同學院的林永倉說類似臺灣的革命實踐研究院；<sup>32</sup> 陳亭卿說得最清楚，他說大同學院是所高級職員訓練所，受訓完後為「高等官試補」，不久再升為高等官，是在官場上要成長的最直接路徑。<sup>33</sup> 何以有大同學院這個訓練機構？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11 月在日本人的運作下，統轄已在奉天省各縣成立的自治會或治安維持會的自治指導部，由于靜遠<sup>34</sup> 任部長，另設自治指導部自治訓練

<sup>29</sup> 臺中廳長枝德二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國籍喪失ニ関スル件〉（大正 4 年 4 月 12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2359 冊。

<sup>30</sup> 〈醫師名簿登錄〉（康德 4 年〔1937〕4 月 1 日），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943（康德 4 年 5 月 24 日），頁 460。王洛，臺北人，1924 年 3 月畢業於臺灣商工學校商科第 5 期。參見〈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至十年學籍簿〉，《滿洲醫科大學檔案》（瀋陽：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檔號：JD24, 54。改籍的原因，據猜測是想要定居滿洲。如陳章哲醫師的改籍考量亦同。參見〈馬賊と大豆粕及び張作霖で有名な滿州（中）：臺灣人の醫者が彼地で成功する農民移民は不適〉，《臺灣民報》，295（1930 年 1 月 11 日），第 11 版。

<sup>31</sup>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丘慧君紀錄，〈謝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 5 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 197。

<sup>32</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永倉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350。

<sup>33</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93。

<sup>34</sup> 于靜遠，1898~1969 年，遼寧遼陽人，畢業於瑞士陸軍士官學校，回東北後歷任東北大學教授、東省特別區警察第三總署長、東省鐵路護路軍總司令部參謀、東北船政局顧問、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參議。九一八事變後任奉天自治指導部顧問兼自治訓練處長，1932 年滿洲國成立後，任滿洲國協和會總務處處長（一說總務廳廳長），翌年底任駐日本公使館參事。1938 年任新京特別市市長，1940 年 5 月任產業部大臣，6 月任興農部大臣。參見〈于靜遠筆供〉，收於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頁 106-108；內尾直昌編，《滿洲國名士錄：康德元年版》（東京：人事興信所，1934），頁 13-14；大阪每日新聞社編，《日本人名選·附滿支人名選》（大阪：該社，1941），頁 379。本書為吳文星教授所提供，謹致謝意。

所，以養成自治指導人材，分派到各地。<sup>35</sup> 1932年1月11日起，訓練現地日、滿人學生20多名。3月15日自治指導部解散，由新設的滿洲國資政局訓練所承接。4月下旬在東京、京都招生，錄取80人；加上在新京（長春）當地錄取的，共97名，就是第二期生，但不久後資政局解散，<sup>36</sup> 大同學院成立後，就由該院接管。自治指導員原是訓練年輕的知識分子，挺身到各縣、旗去指導自治、維持治安，到大同學院時代，受訓者就改稱參事或副參事官，<sup>37</sup> 意義也就不太相同。

滿洲國在1932年3月1日成立，7月11日即以教令60號，發布大同學院官制，設院長、教授、事務官、屬官等，而院長是在總務長官的監督下綜理院務，屬國務院總務廳，主要目的是「為養成訓練官公吏或將為官公吏者之所」。<sup>38</sup>

1932年開始招收第一部第一期生，所謂第一部指「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畢業者中直接採用」，亦即由上述學校畢業者經考試及格後得入大同學院接受訓練。第一部專門訓練日系（日本、朝鮮、臺灣）學員。在招收第三期生時，對滿洲人的應考者沒有特別規定，但對日本人則規定1933年後畢業者（1934年3月有畢業可能者也包括在內），其銓衡（指口試和身體檢查）則在東京、京都、仙台、福岡、新京舉行，<sup>39</sup> 在臺灣未設銓衡地，因此經筆試合格的臺人，都往福岡銓衡。到1935年10月第一部招收第五期生時，改由現任職員中選拔入學，並設制第二部招考不懂日語的滿系學生，但僅招七期。由1932年到1936年可謂大同學院的前期。1937年起是為中期，翌年改正官制，直屬國務院總理，除養成中堅文官外，還接受委託訓練地方團體、協和會、特殊會社的職員。1940年官制改正後，大同學院成為管理滿洲國境內所有中間指導者之養成機關。除官制的修正外，1938年公布文官令，只要是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者都能入大同學院受訓，亦即只看實力不看學力，且不會有如日本形成學閥。1941年起為後期，這時期有些學生對建國當初標榜的王道主義、五族協和是否能實現抱持著疑問。後期中的第十六期生、

<sup>35</sup> 〈于靜遠筆供〉，頁108-109。

<sup>36</sup>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上卷·總論》，頁250。

<sup>37</sup> 于靜遠的筆供沒有談到改為資政局一節。曾就讀大同學院的李水清則提出如上的看法。李水清，〈東北八年回憶錄（1938年4月至1946年7月）〉（未刊稿），「大同學院與建國大學關係」。本文承李水清先生提供，謹致謝意。

<sup>38</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23（大同元年7月11日），頁1。

<sup>39</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287（大同2年12月12日），頁17-19。



第十七期生則有白俄學生，以及建國大學畢業生進入。這時期日系一畢業就應召入軍營，至於未應召的則到地方去增加生產供糧，或負擔國境的建設，或到各街村當指導員。1943年設了研究所，可和日本總力戰研究所相匹敵，而人員也互相交流。大同學院在1945年8月15日第十九期生與研究所第二期生畢業後解散。據云前後訓練的學生有4,000名。<sup>40</sup>

大同學院共分為三部，第一部如前所述，訓練大專以上畢業生，到1938年後就是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者。第二部1935年設立，由不通日語、中學畢業的滿系子弟入學，僅辦七期，於1941年結束，即所謂的舊二部。而後第一部除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者外，加上銓衡及格者，及準上協和會、公共團體、特殊會社與其他特殊團體的職員，修學期間1年。第二部是高等文官登格考試或銓衡及格者，以及準上協和會、公共團體或特殊會社及其他特殊團體的職員，在學期間6個月。第三部學生為薦任文官服務三年以上，與準上協和會、公共團體及特殊會社、其他團體的職員，在學期間6個月。<sup>41</sup>

當時的考試科目有四科：1、法制（日本憲法、日本民法〔總則〕）；2、經濟（經濟原論）；3、語學（日語之外英語、法語、德語、俄語中任擇其中一譯）；<sup>42</sup> 4、常識（時事問題及其他一般常識問題）；其次接受口試及身體檢查。<sup>43</sup> 有關口試到底都問些什麼？可以由兩個例子來說明。任新銘為大同學院第一部第十二期生，中國人（當時稱滿系），他的口試題目為「日本精神是什麼？」第二題是「在平地上設下水道，要如何作？」第三題是「常常泛濫的河，要在河上架橋，如何決定寬度？」第一題的答案他說是堅忍不拔的精神，第二、三題他無法作答，就說不知道，最後幾個考官還消遣他，「你會說中國話嗎？」他想說可能考不上了，但卻收到合格通知單。<sup>44</sup> 另一位是朝鮮人（當時稱鮮系）具鳳會，是第一部第十三期生，他出身於私立普成專門學校（今高麗大學前身），是反日的堡壘，本身

<sup>40</sup>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上卷·總論》，頁251-255。

<sup>41</sup> 柏崎才吉編，《滿洲國現勢：康德八年版》（新京：滿洲國通信社，1941），頁106。

<sup>42</sup> 原文為「滿譯」。滿譯即中譯。

<sup>43</sup> 〈關於對於留日學生補招大同學院第一部生之件〉，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138（康德5年1月18日），頁442。

<sup>44</sup> 任新銘，〈友情的架橋〉，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的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錄》，頁39。

卻參加滿洲高等文官考試，心中不無掙扎，他接受一個半小時的口試，主要問「南總督（南次郎，1936.8-1942.5）在朝鮮的統治如何？」第二題「滿洲的民族協和與朝鮮皇民化政策的比較。」具大膽批評南總督創氏改名、皇國臣民化，東亞、朝鮮日報被停廢刊的政策不當。口試委員以波蘭被大國分割為例勸告應有順應時勢的美德，具以愛爾蘭獨立成國為例回答。由於自認這樣的回答應該不被錄取，卻收到合格通知。<sup>45</sup> 由上可知口試必須面對專業、政治的問題，究竟口試委員以何種標準計分，則不得而知。1938年文官令頒布後，應考的資格限制、地點都有不同。

### （三）大同學院的訓練

大同學院主要在訓練入院者成為優秀的官吏，畢業後能到邊區去從事自治指導、深入民間，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為了達成上述目的，凡入大同學院者，接受三個月、六個月或一年不等的訓練，並合宿於學寮，以便養成「無我至純、信賴團結」的學院精神。<sup>46</sup> 訓練內容分敘如下：

1.學科訓練：以第一部為例，都在5月入學之後到6月的期間，接受如下學科訓練，即日本語精神論、建國精神論、國家經營論、士道、論政府機構及運營，協和會、特殊會社的運營機構、國勢各論，語學的訓練及教習。<sup>47</sup> 授課時間一般在早上。

2.精神訓練：則是聆聽相關演講，如講述大川周明的興亞論，<sup>48</sup> 又1945年4月日本駐德國大使在旅順對大同學院生訓話，這時他正經由西伯利亞、柏林回日本。他說明當時世界的局勢，柏林陷淪即在眼前，日、德、義三軸心國已注定要吃敗仗。<sup>49</sup> 此外必須要徹底守時，日常行事完全按照預定的時間進行，不能快或

<sup>45</sup> 具鳳會，〈風波 波濤〉，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67-68。

<sup>46</sup> 蕭玉相，〈学院同窓會員に望む〉，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60。

<sup>47</sup> 柏崎才吉編，《滿洲國現勢：康德八年版》，頁107。

<sup>48</sup> 尹富炳，〈我が人生と大同学院〉，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28。

<sup>49</sup> 朱有昌，〈鍊成生活〉，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172。

慢，如星期六下午允許外出，但要分秒不差的回來，若不守時有時還會被關在南嶺校園三樓的忠靈塔中。起床時間到集合的時間很短，但不能因而早起。<sup>50</sup> 到戰爭後期煤炭不足，學生沒有暖氣，起床後 5 分鐘要集合，要將十條毛毯一一折好常常來不及，最初的二、三天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sup>51</sup> 此外如早上必須遙拜、食前要默禱。<sup>52</sup>

3.體能訓練：行軍並在這當中進行模擬戰，中午吃飯後稍做休息，下午繼續前進，往往因天悶或下大雨而增加行軍的困難，常常走到鞋底脫、腳起泡。行軍後必須聽教官的講評，隔日到地方聽縣長或副縣長說明該縣的施政方針，到處參觀，<sup>53</sup> 以便增強體力、了解地方。騎馬也是必要的訓練，除了體能還包括技術。當騎馬由原來的「並足」（普通步伐）到「駢足」（快跑），馬跑起來後，隊伍凌亂，馬也很難止住，往往就有人摔下馬來。<sup>54</sup> 此外如冷天氣早上吃飯前，只穿一件襯衫在坡道上走，到海邊用水澆頭，游泳也必須訓練。大抵每早要跑步、快走、慢走，並用乾布摩擦身體，<sup>55</sup> 使身體保持健康。

在生活上採全體合宿，越到戰爭後期糧食缺少，配給糧食時，卻因民族而異，日人吃米，滿洲人、朝鮮人配高粱，且有等級分配，這時大家將配給所得的米、粟、高粱、玉蜀黍、大豆等糧食煮成一鍋，以一點油和蔬菜做配菜，大家一起吃，<sup>56</sup> 也有在興凱湖練習游泳時，抓到魚，立刻做成生魚片來吃，這給他們單調的生活中帶來愉悅，也曾有過全部學生在操場吃飯，看著月亮升起的時候。<sup>57</sup>

6 月就到各地方省縣出差，進行實態調查與研究。後期 7 月到 11 月，為了應付畢業後要到第一線從事業務，因而配屬到各局部接受實務指導。之後學習研究國際論、民族論、東亞文化史、東亞政治政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國際情勢。<sup>58</sup>

<sup>50</sup> 蕭玉相，〈学院同窓會員に望む〉，頁 60。

<sup>51</sup> 朱有昌，〈鍊成生活〉，頁 170。

<sup>52</sup> 鄒元植，〈畏友〉，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 166。

<sup>53</sup> 楊世基，〈農安行軍記〉，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 179-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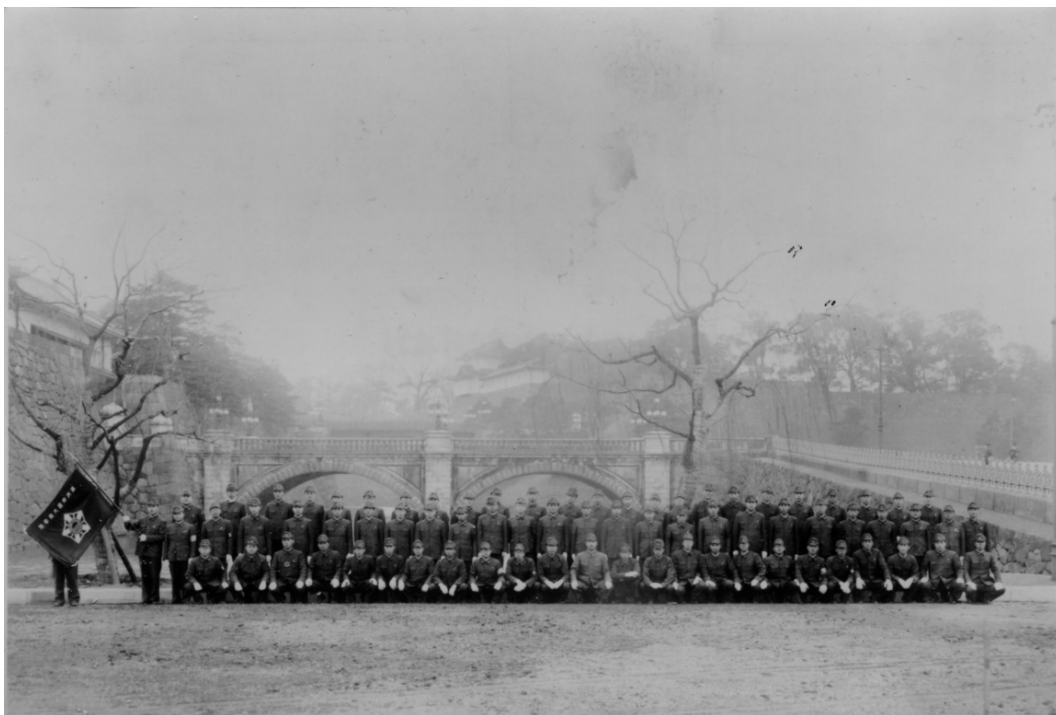
<sup>54</sup> 朱有昌，〈鍊成生活〉，頁 173。

<sup>55</sup> 白蔭泰，〈大同の境域〉，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 145。

<sup>56</sup> 白尚健，〈友情不變〉，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 158。

<sup>57</sup> 尹富炳，〈我が人生と大同学院〉，頁 29。

<sup>58</sup> 柏崎才吉編，〈滿洲國現勢：康德八年版〉，頁 107。



說明：考上大同學院者起程赴「滿洲國」前，到日本皇居二重橋前合影。

圖片來源：陳許碧梧女士提供

據就讀大同學院者的回憶，最令學生高興的有觀光、調查旅行與農村調查。所謂觀光旅行，包括外地考上大同學院後到日本集合，然後集體到新京的過程。據第十三期生蔡西坤的回憶，被錄取後先到東京日本青年會館報到，然後與同學沿途視察，一路上由日本乘船到釜山，再到大連、新京，最後到新京南嶺大同學院的校園<sup>59</sup>（1934年9月23日落成）。其次是在縣中參觀旅行與實務教育，第十七期生的朝鮮人白尚健，參加東滿班，而得以參觀吉林、延吉、牡丹江、佳木斯、密山、興凱湖、東寧、綏芬河、鶴岡炭田、松花江、哈爾濱，看到鏡泊湖之美麗景觀，也看到可以匹敵鴨綠江水豐水庫的豐滿水庫，以及鶴岡煤礦的地下資源，同時到地方則有次官級的人來指導，做實務教育。<sup>60</sup>第十六期生的李水清，在1943年7月入大同學院，接受約100天的訓練，先是一個星期在東嶺縣鏡泊湖露

<sup>59</sup>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蔡西坤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175-176。

<sup>60</sup> 白尚健，〈友情不變〉，頁150。

營，另一個月分成四組（班），即治安、農村、開拓、重工業組，分別實習，李水清分到重工業組，故到瀋陽、撫順、鞍山、大連、旅順、大石橋等地的重要工廠參觀，<sup>61</sup> 院方這些活動，應是基於「經驗是無形之財產」<sup>62</sup> 所做的安排。這種分班進行的旅遊，不僅增加見聞，也使班上的同學情誼更為加深。

比參觀旅行更值得一提的是農村調查，如 1933 年大同學院學生 111 名，分成 9 班對全滿洲加以視察，自 7 月 6 日起二週。此一調查旅行是為將來實際行政做為準備，也為了加深對地方的瞭解，因而旅行過後必須寫成報告書。由於當時有關滿洲的資料不多，而且地方提供的數字，也有一些難以置信之處，再加上這次旅行，是在炮彈下的潛行，或受匪賊襲擊，故還沒達到最好的境地，但畢竟是入險地與僻地所得的結晶。大同學院將此報告書出版，<sup>63</sup> 內容分縣為之，先有旅行路線（圖）、旅行日誌，接著是各縣報告，大抵包括總說、治安及警察、財政、商業及金融、農業、工業、教育及宗教、社會事業、衛生、地方制度，有時還有附錄，每班的內容也略有不同。當時臺人黃瀛澤在第二班，走的是新京、四平街、梨樹、鄭家屯、洮南、洮安、三爺廟、洮安、泰來、チチハル（齊齊哈爾）、江橋、嫩江、ハルビン（哈爾濱）、寬城子路線；黃清塗在第八班、黃千里在第六班。

大同學院 13 年間共訓練了 4,000 人，其中以日本人最多，此外包括滿、漢、蒙、回、達（ダグール）、<sup>64</sup> 朝鮮人、臺灣人以及白俄。<sup>65</sup> 此學院以五族協和為標榜，有一姓日向的日本人，到滿洲後看破所謂標榜的共存共榮、五族協和都是假的，他再也不能忍耐要退學。<sup>66</sup> 也有朝鮮人具鳳會，雖已經盡力勸慰「鮮系」開拓民，已是五族協和中的一員，因此要有昂揚的主人意識，卻被日本憲兵隊長

<sup>61</sup> 李水清，〈東北八年回憶錄（1938 年 4 月至 1946 年 7 月）〉（未刊稿）。

<sup>62</sup> 白尚健，〈友情不變〉，頁 149。

<sup>63</sup> 〈刊行之辭〉，收於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新京：大同學院，1933）。全書一共為 1,888 頁。

<sup>64</sup> 又寫成ダフル，即達斡爾族，分布在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斡爾族區，少數在新疆塔城市，約 132,747 人（2000 年的統計），講達斡爾語，滿洲國帝后郭布羅婉容即達斡爾人，清代一度被稱為索倫人，一般放入滿系，以放牧為生，有定住的家屋，並僱人協助畜牧。參見佐藤定勝編，〈最新滿洲帝國大觀〉（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7），頁 104。1953 年正名，似為契丹人後裔。

<sup>65</sup> 孟和博彥，〈同窓再會〉，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 136；白蔭泰，〈大同の境域〉，頁 145。

<sup>66</sup> 鄒元植，〈畏友〉，頁 167-168。

認為他仍是「不逞鮮人」，再如何盡力終是「你是鮮系」，因而往後只好明哲保身。<sup>67</sup>

由於有幾個月甚至半年、一年的相處，學生間不分種族都結了很深的友誼，雖然戰後各奔西東，各遇艱困，終能在戰後四、五十年過去，重新再架起友誼的橋，體現「一度入南嶺，終生為兄弟」<sup>68</sup>的情懷。1981年起，每隔2年大同學院同窓會<sup>69</sup>就辦一次南嶺會第○回友好訪中團，而在日本同學也協助中國同學後裔赴日留學，重拾南嶺人的兄弟緣。

### 三、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與大同學院

#### (一) 1938年公布〈文官令〉

滿洲國成立於1932年，但首次發布完整的文官體系相關的命令，是1938年5月7日的敕令第95號〈文官令〉，用來規範文官的考試、任用、官等、給與等，其後至1945年8月間，又陸續地發布了幾次文官修正令，用以修正文官體系的相關規定。<sup>70</sup>〈文官令〉上的規定，基本上只闡明大原則，關於文官考試、應試者的應試資格或學力認定等細節，則規定於其後發布之〈文官考試規程〉與〈文官令之指定認定〉等法令中，前者載明文官考試相關的細節，後者則載明文官考試應試者的學力認定或應試資格等。以下就〈文官令〉、〈文官考試規程〉以及其相關的指定認定之法規演變，來觀察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的變化。

關於滿洲國高等文官的種類，〈文官令〉第十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文官分為高等官、委任官和試補。高等官再分為特任官、簡任官及薦任官；試補可以再分為「高等官試補」和「委任官試補」，而「高等官試補」準於高等官，因此滿洲國高等文官是為特任官、簡任官、薦任官，和「高等官試補」四種。<sup>71</sup>在文官任用上，根據〈文官令〉第二章第五十四條的任用規定，特任官可以自由任用；<sup>72</sup>簡

<sup>67</sup> 具鳳會，〈風濤 波清〉，頁75-76。

<sup>68</sup> 宗芳公，〈日本の同窓を迎えて〉，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21。

<sup>69</sup> 孟和博彥，〈同窓再會〉，頁140-141。

<sup>70</sup> 〈文官令〉，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222（康德5年5月7日），頁175-188。

<sup>71</sup> 〈文官令〉，頁177。

<sup>72</sup> 〈文官令〉，頁180。

任官、薦任官，和「高等官試補」的任用，原則上必須透過文官考試的系統，才能進入高等文官的體系。而在考試種類上，根據〈文官令〉的說明，文官考試分為高等官考試及委任官考試，高等官考試由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負責，分為採用、適格及登格考試，而適格、登格考試又分為行政科和司法科兩科。<sup>73</sup> 這三種考試的進行，根據〈文官令〉第三十條規定，適格考試為考察既往之勤務成績、考察識見、執務能力和語學；登格考試則為審查既往之勤務成績、考察識見、基礎的學術、執務能力和語學；採用考試則施行有關於人物、識見、及基礎的學術考察，以及身體檢查。依〈文官令中修正之件〉第六十九條又再細分資格和採用考試兩階段，基礎學術考察在資格考試階段實施，人物、識見、身體檢查則在採用考試時施行。<sup>74</sup>

此三種考試的實施方式多以口試和筆試進行，適格和登格考試為體制內文官升遷考試，採用考試則從體制外拔選人才，而從此三種考試的公告簡章上來看，從體制外進入文官體系的應試者，必須在採用考試及格後進入大同學院受訓，才得以成為滿洲國官吏，而體制內的升遷則不需此訓練過程。當時考試的必考科目有 6 科（每科 2 小時），即 1.滿洲國基本法（得以日本憲法代之），2.滿洲國民法，3.經濟學，4.東洋史（日本史及滿洲、中國史中任選其一），5.語學：除應考者常用語言外，就滿、日、蒙、英、德、法、俄語中擇一，6.常識。選考的科目則有 12 科（其中選擇 2 科應試），分別是哲學概論、世界地理、社會學、財政學、經濟史、商法、刑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sup>75</sup> 由於本文探討大同學院與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與任高等官之間的關係，因此將重點放在需要進入大同學院受訓之大同學院的自招、高等官採用考試，以及後來的高等官資格採用考試的分析上。

## （二）1940 年的〈文官令中修正之件〉

從 1940 年 3 月 31 日《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764 號中的「文官考試圖解」（圖一）可窺知當時的滿洲國文官體系，以及進入高等文官官階的管道。從「文官考

<sup>73</sup> 〈文官令〉，頁 178。

<sup>74</sup> 〈文官令〉，頁 178；〈文官令中修正之件〉，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942（康德 7 年 10 月 15 日），頁 312。

<sup>75</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233（康德 5 年 5 月 20 日），頁 728-734。

試圖解」來看，想要成為高等文官，途徑有三，一是特別任用，一是高等官登格考試，一是高等官採用考試和適格考試，除了特別任用外，其他皆為考試的途徑。前二者為文官體制內的委任官，被拔擢為高等文官之薦任官的途徑。根據〈文官令〉第六十六條規定：「及格於甲種委任官適格考試，或登格考試之委任官，於考試及格後在職七年以上者，得經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之銓衡任用為薦任官」，此為特別任用的途徑。<sup>76</sup> 而高等官登格考試的規定，則見於〈文官令〉第四十一條：「各科（司法科、行政科）高等官登格考試，凡及格於該科甲種委任官適格考試或登格考試之委任官，於考試及格後在職三年以上，且未滿四十歲者得應試之，但不得超過三次。」<sup>77</sup> 第三種為高等官採用考試和適格考試的途徑，此為從文官體系外經過選拔而進入高等文官體系。根據〈文官令〉第四十條和第七十條的規定，應試者可透過參加高等官採用考試，通過後即成為官階準於高等官的「高等官試補」，而在職一年以上至三年六個月以內者，可應試高等官適格考試而被拔擢為薦任官。<sup>78</sup>

1940年3月31日的「文官考試圖解」呼應著1938年5月7日〈文官令〉，形成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的基本架構。其後至1945年滿洲國結束為止，較大的結構性變動為1940年10月15日所發布的敕令第245號〈文官令中修正之件〉中所做的修正，主要的變動為，原先的高等文官採用考試再細分為資格考試和採用考試。<sup>79</sup> 應試者需先通過資格考試後，才得以進一步應試採用考試，通過後一樣成為「高等官試補」，在任職一年後可應試高等官適格考試。1940年的〈文官修正令〉中所分化出來的「資格—採用考試」系統，一直進行到1945年，資格考試因時局關係而暫停舉辦，根據1945年5月14日的敕令第152號和院令第25號之〈文官考試之時局特例〉，高等文官考試的資格考試取消，採用考試則權宜性地加入了原本於資格考試的實施項目。<sup>80</sup> 由1943年的「滿洲國文官任用制度

<sup>76</sup> 〈文官令〉，頁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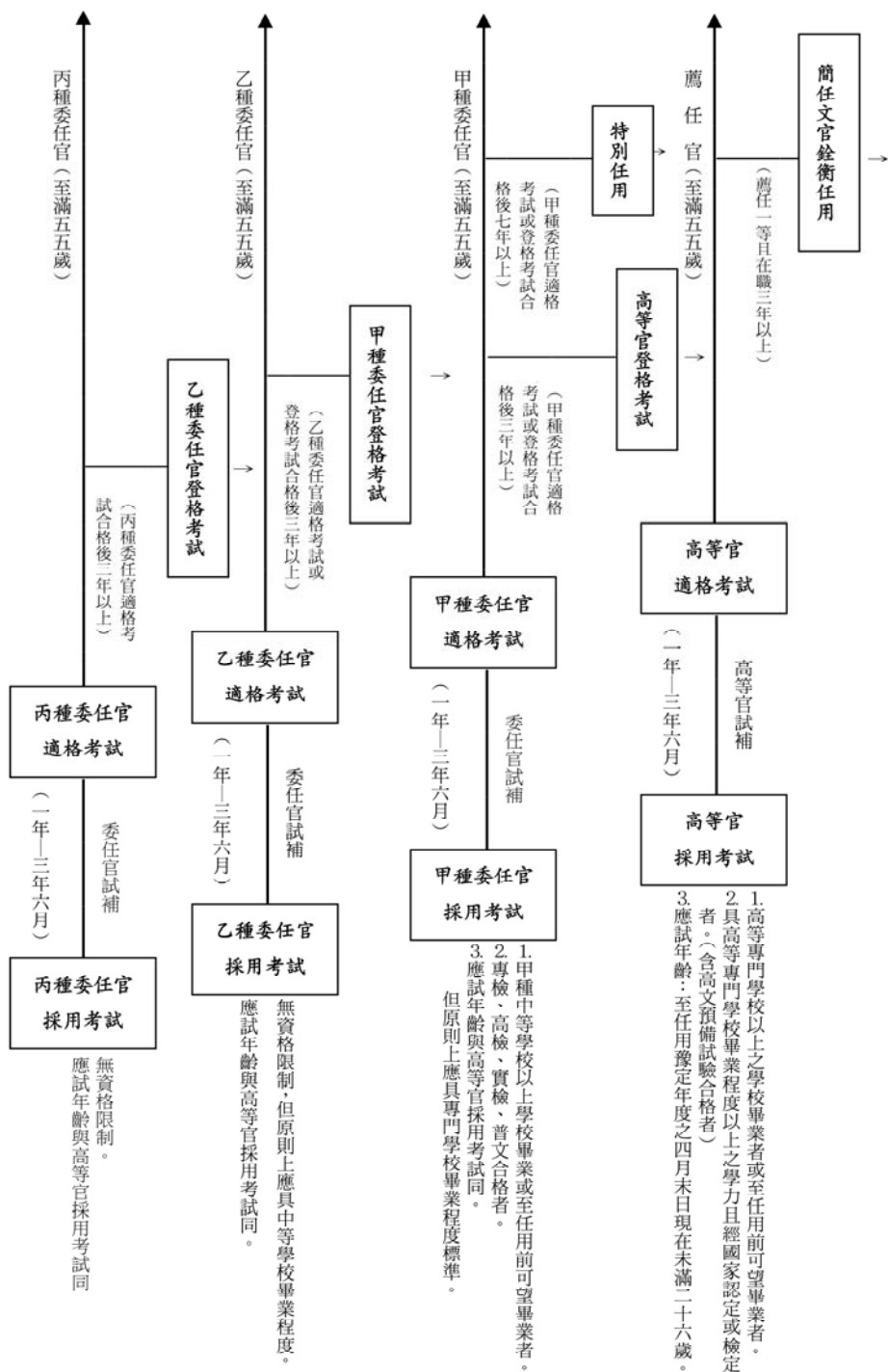
<sup>77</sup> 〈文官令〉，頁179。

<sup>78</sup> 〈文官令〉，頁179、182。

<sup>79</sup> 〈文官令中修正之件〉，頁306-314。

<sup>80</sup> 參見〈敕令第152號：文官考試之時局特例〉，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3268（康德12年5月14日），頁177-178；〈院令第25號：文官考試之時局特例〉，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3268（康德12年5月14日），頁186-189。





圖一 文官考試圖解

資料來源：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764 (康德 7 年 3 月 11 日)，頁 300。

圖解」(圖二)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高等官任用的過程。1938年5月7日所發布的〈文官令〉於同年度10月1日正式施行,<sup>81</sup>而在其發布之前的現職人員的官種對照問題,從同年9月22日的敕令第232號〈關於依文官令第一百十八條規定之現職者之特例之件〉中可得到解答,其中關於高等官之薦任官與「高等官試補」的資格對照,多有所描述。例如,在文官令施行之際已為薦任行政官、司法官、技術官、教官者,可依其人物、能力、勤務成績和履歷,而視為及格於高等官適格考試;而已為學習法官、通過高等官採用考試或司法考試者,可視為通過高等官採用考試,是為「高等官試補」等。<sup>82</sup>

關於大同學院,〈關於依文官令第一百十八條規定之現職者之特例之件〉中則明文補充了〈文官令〉發布前於大同學院畢業、在學、或已取得入學許可之學員的文官官等資格問題。其中規定:

第二條:文官令施行之際,現畢業於大同學院第一部而為委任官、委任待遇官吏、或雇員者之全員,及畢業於大同學院第二部而為委任官、委任待遇官吏、或雇員者之中,由國務院總理大臣認為成績特別優秀者,其可為行政官或司法官者,視為及格於高等官採用考試者。其可為技術官者視為經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之銓衡者任用為高等官試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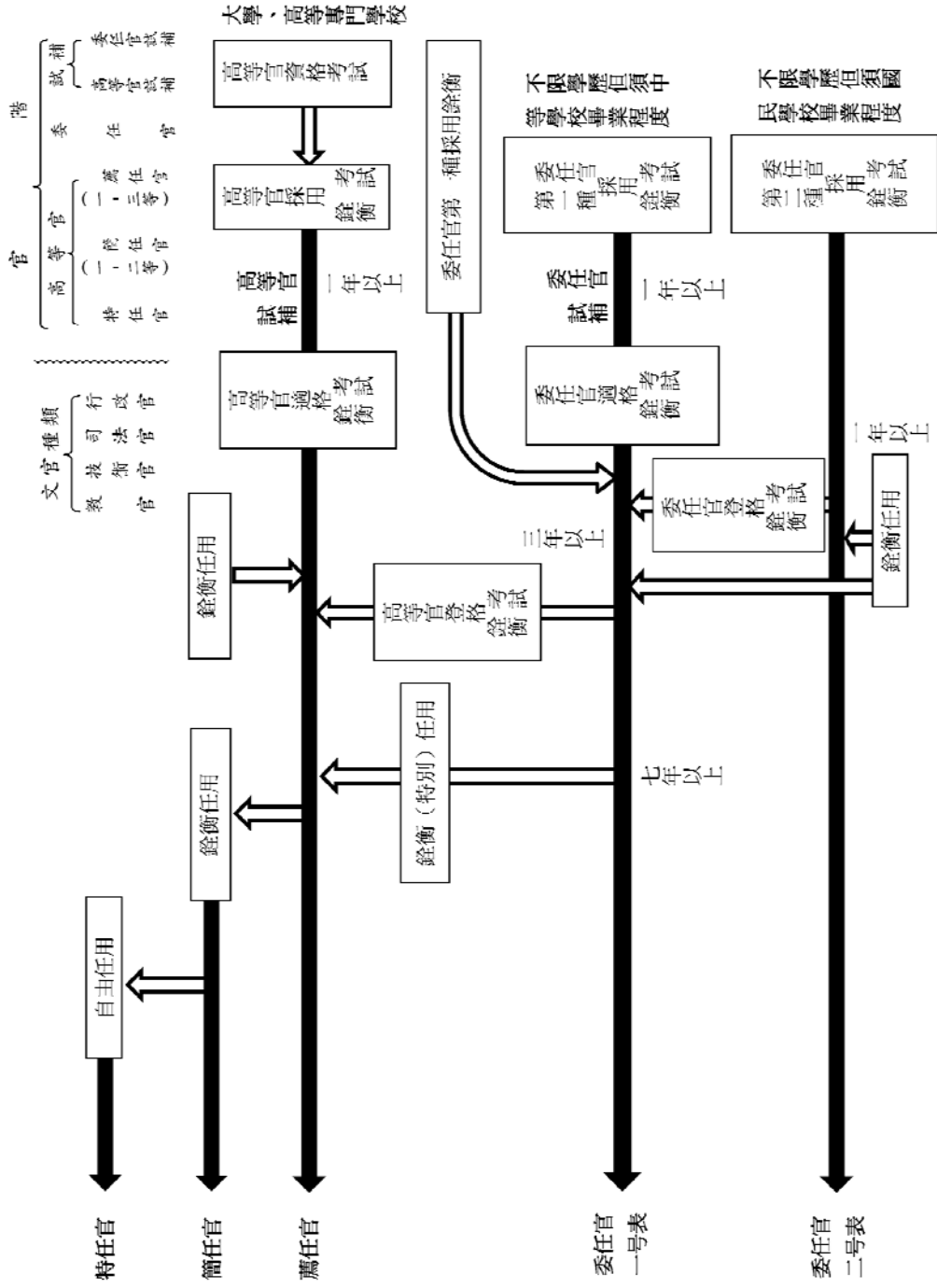
第五條:文官令施行之際,現於大同學院第一部在學中之委任官,其可為行政官或司法官者,視為及格於高等官採用考試者,任用為高等官試補。其可為技術官者,視為經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之銓衡者任用為高等官試補。

第六條:已被許可入學於大同學院第一部,而於文官令施行之際現對於入學延期中者,於其事由終止時,准於前條之規定任用為高等官試補,但被取消入學許可者不在此限。<sup>83</sup>

<sup>81</sup> 〈文官令施行日期〉,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5年9月22日),頁108。

<sup>82</sup> 〈關於依文官令第一百十八條規定之現職者之特例之件〉,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5年9月22日),頁32-39。

<sup>83</sup> 〈關於依文官令第一百十八條規定之現職者之特例之件〉,頁32。



圖二 滿洲國文官任用制度圖解

資料來源：國務院總務廳人事處人教科編，《滿洲帝國文官制度概要》(新京：該處，1943)。

由此三條規定可知，文官令發布前的大同學院第一部畢業或在學、或已取得入學資格者，皆具有「高等官試補」之高等官資格，而在文官令發布前的第二部畢業之委任官，則有機會被直接「擢升」而具有「高等官試補」之高等官資格。

表一 高等文官考試舉行情形

年份	1938 年以前	1938-1940 年	1941-1944 年	1945 年
考試名稱	大同學院招生考試	採用考試	資格考試 採用考試	採用考試 (加入某些資格考試項目)
招生頻率	第一部共十期 第二部共七期	一年一次	一年各一次	一年一次
簡章類型	大同學院招生	1.行政官、司法官 2.技術官、(教官)	1.行政官、司法官 2.技術官、教官	行政官、司法官、 技術官、教官

資料來源：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

製表：助理藍瑩如

從舉行考試的情形來看（表一），可看出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的運作情形。1938 年以前，大同學院第一部共招生了十期、第二部共招生了七期，在簡章上的標題都以「大同學院招生」為條目，也都有詳細記載關於及格者進入大同學院受訓的規定，可清楚看出大同學院的運作。<sup>84</sup> 1938 年以前的大同學院招生情形是不規律，但在〈文官令〉發布之後的高等文官考試，則漸趨規律，但仍有些微的變動。首先是 1938 到 1940 年，由大同學院招生考試改為高等文官考試，以一年一次的「採用考試」形式舉行，簡章類型則分為「行政官、司法官」和「技術官」兩種，而在 1940 年的技術官考試中，則開始新出現了「教官」的類項。1941 年到 1944 年間，則因為高等文官考試的修正，而將原本的採用考試再細分為「資格」和「採用」考試兩種，頻率上也維持一年各舉行一次，資格考試在採用考試之前舉行，簡章類型則為「行政官、司法官」和「技術官、教官」兩種。<sup>85</sup> 到

<sup>84</sup> 大同學院第一部第十期在《滿洲國政府公報》上的正式名稱為「大同學院第一部（一般文官）招生」和「大同學院第一部（技術官）招生」，原始簡章並無「第十期」字樣，雖其考試形式和內容皆已具備後來的高等文官考試雛形，但因其時間點位於〈文官令〉發布之前，且仍以大同學院名義招生，可見其位於過渡時期的特性，因此本文為了整理方便，仍將其歸為大同學院第十期的「一般文官」和「技術官」招生兩個項目。

<sup>85</sup> 1944 年的採用考試則合併兩種類型的考試成為「行政官、司法官、技術官、教官」，並只舉行一次。

1944年為止考試的相關規定已趨於完整與規律化，但1945年的考試則受到資格考試取消的影響，只安排一次採用考試，<sup>86</sup>但並未如期舉行，之後滿洲國即滅亡。

## 四、畢業於大同學院的臺灣人

如果不是有29個臺灣人曾到大同學院就學，則本研究就不在臺灣史的範圍之內。臺灣人畢業於第一部的有25人，第二部的有4人。由於第二部的資料較缺，本論文將重點放在第一部，將先探討這些名單如何建立，何以用同窓會名簿，而非用《滿洲國政府公報》。

### （一）《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中的臺灣人

大同學院第一部一年到底收多少人，日人、韓人、臺人、其他人（包括當時的滿洲人，有時有白俄、ダグール人）的比例又如何（詳見表二）。大同學院一共十九期，<sup>87</sup>在1936、1943兩年各招生兩期。《滿洲國政府公報》所載的為大同學院的錄取學生名單，但《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的名單卻是畢業生名單。在此有必要說明兩種名單的特點與缺陷，以及本文以《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為主要文本的原因。

#### 1. 《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簡介

《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為「大同學院同窓會」的出版物。該會於1943年5月9日制定會則，至1998年間有多次改正。依照會則，該會會員可分：

（1）特別會員：如大同學院院長、參與、教官、助教官、事務官及醫官或贊同該會主旨且經總會推舉者。

（2）正會員：如大同學院畢業生及研究所研究員，或曾參加大同學院主辦之講習會，會員遺族欲入會者。

<sup>86</sup> 由於未見相關資料，應是二戰結束的關係，1945年的採用考試並未實際舉行。

<sup>87</sup> 〈大同学院の解散〉，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会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198-199。在知道日本投降後，於8月15日下午2時舉行大同學院的解散宣示。

而該會的業務，主要為編纂名簿、發行會報、援助過世會員的遺族、各種資料的蒐集及研究調查等。

此一名簿內的名單，分為特別會員、正會員（第十七期分成前、後期兩期）、研究所（共二期）、中堅指導者（共五期）與自治指導部訓練所（僅一期），且書末附上五十音順別的索引。每期又以發行時仍健在者、消息不明者、物故者及「遺族名·住所·死去年月日等不明者」分類，並依「イロハ」順別列出會員姓名。除了會員姓名外，依類別而各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及資訊，茲整理如下：

~~~~~

**第○期生**

昭和△年△月畢業□名

| 姓名 | 服務單位 | 服務單位電話 | 郵遞區號 | 現住所地址 | 電話 |
|----|------|--------|------|-------|----|
|    |      |        |      |       |    |

【消息不明者】（僅列姓名）

【物故者】

| 姓名 | 遺族姓名 | 死亡年月日 | 郵遞區號 | 遺族現住所地址 | 電話 |
|----|------|-------|------|---------|----|
|    |      |       |      |         |    |

【遺族名·住所·消息不明者】（除姓名外，有時也會列出已知資訊）

~~~~~

在「姓名」欄內，同時也會列出會員個人的其他姓名，此點利於找出日治時期曾更改姓名的朝鮮人、臺灣人等以及已從妻姓的日本人。「服務單位」則可做為此人大同學院畢業後的經歷參考。而從「住所地址」中，往往也能藉此粗略分辨其為朝鮮人、臺灣人或中國人士。

不過，名簿前面所列的這些資料僅就該會所能掌握的「會員名單」，細數後可以發現與頁面上的「畢業人數」不符。那些看似消失的畢業生，其實位於索引內，若非與《滿洲國政府公報》上的文官考試榜單比對，一不小心便會遺漏。

## 2. 與《滿洲國政府公報》所載之文官考試榜單的比較與利用

《滿洲國政府公報》（以下簡稱《公報》）理當是研究滿洲國文官考試的首要史料，為何卻選擇《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來使用呢？有幾點考量：

(1)《公報》刊載的文官考試榜單，其實就是「大同學院」的入學名單，但就《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及其畢業生的陳述來看，有些人不是沒入學、就是中途休學。這些人沒有畢業，怎具有滿洲國高等官的資格？當然難以運用在高等官吏任用、晉升的討論中。

(2)《公報》內的榜單，排序法有依應試地、准考證號碼與科目別，也有無法看出排序依據的名單。僅憑錄取者姓名，往往難以辨識其民族別（如漢人、朝鮮人姓名，以及改為日本姓名者），更有同名同姓者的問題，而要從此搜尋個人資料，宛如大海撈針。且《公報》缺大同學院第一期、第二期<sup>88</sup>與第十七期後期的榜單，並不完整。

(3)《公報》目前雖有影印本出版品，但部分文字模糊難辨，且標題名稱不一，增加閱讀與搜尋的困難度。

不過在使用《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時，也有必須注意的地方。如第十四期後的畢業生名單，有些人的入學期別，與《公報》榜單不同。且兩者在「姓名」部分都有同音異字的狀況。另外，名簿裡滿籍、俄籍等畢業生的資訊極少。最重要的，滿洲國文官考試高等官有行政官、司法官、技術官、教官四類，但在《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裡無法看出該員的類別，也無法得知其人是否為協和會的依託學生，或所謂公共團體及特殊會社其他特殊團體的職員。

舉例來說，第二期考上的臺灣人只有陳錫卿和黃瀛澤 2 人，但那年畢業生臺人就有 5 人，多了黃千里、黃清塗、歐陽餘慶等 3 人，究竟第一期就考上，還是由另一管道入學延至第二期才畢業，則不得而知。另外要說明的是 1998 年版的《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並未包括舊二部、新二部、新三部，之所以知道舊二部的名單，主要來自 1942 年版的《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藏於中國遼寧省檔案館），但缺 1942 年以後的名單。

---

<sup>88</sup> 缺第一期乃因 1932 年 1 月 11 日由自治指導部訓練所招募 20 人訓練，但 3 月 15 日自治指導部解散，轉由資政局訓練所承接。到 4 月下旬又在東京、京都選考了 80 餘名，加上新京當地 10 多人，這些人為 7 月 11 日創設的大同學院所承接，做為第一期生。因而沒有公布錄取名單在《滿洲國政府公報》上。參見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上卷·總論》，頁 250-251。缺第二期的原因不詳。

表二 《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1998年版)：  
第一部日本、朝鮮、臺灣畢業生的人數與比例

期數 地方	第一期 (1932年 10月畢)	第二期 (1933年 10月畢)	第三期 (1934年 10月畢)	第四期 (1935年 10月畢)	第五期 (1936年 6月畢)	第六期 (1936年 12月畢)	第七期 (1937年 5月畢)	第八期 (1937年 11月畢)	第九期 (1938年 4月畢)	第十期 (1939年 5月畢)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日本	90(91%)	72(87%)	77(90%)	86(97%)	94(96%)	67(90%)	80(100%)	90(95%)	94(96%)	82(94%)
朝鮮	1(1%)	4(5%)	3(3%)	1(1%)	1(1%)	2(3%)	0(0%)	3(3%)	4(4%)	3(3%)
臺灣	0(0%)	5(6%)	5(6%)	0(0%)	1(1%)	0(0%)	0(0%)	1(1%)	0(0%)	1(1%)
其他 (含不明者)	8(8%)	2(2%)	1(1%)	2(2%)	2(2%)	5(7%)	0(0%)	1(1%)	0(0%)	2(2%)
合計	99(100%)	83(100%)	86(100%)	89(100%)	98(100%)	74(100%)	80(100%)	95(100%)	98(100%)	88(100%)

期數 地方	第十一期 (1939年 12月畢)	第十二期 (1940年 11月畢)	第十三期 (1941年 11月畢)	第十四期 (1942年9 月畢)	第十五期 (1943年7 月畢)	第十六期 (1943年 10月畢)	第十七 (前)期 (1944年 9月畢)	第十七 (後)期 (1944年 11月畢)	第十八期 (1945年7 月畢)	第十九期 (1945年8 月5日畢)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日本	73(86%)	108(94%)	169(92%)	87(88%)	101(88%)	51(88%)	113(90%)	184(99%)	94(88%)	1(2%)
朝鮮	4(5%)	2(2%)	7(4%)	8(8%)	8(7%)	5(9%)	7(6%)	0(0%)	6(6%)	0(0%)
臺灣	1(1%)	0(0%)	2(1%)	2(2%)	2(2%)	2(3%)	1(1%)	0(0%)	1(1%)	0(0%)
其他 (含不明者)	7(8%)	5(4%)	6(3%)	2(2%)	4(3%)	0(0%)	4(3%)	2(1%)	5(5%)	50(98%)
合計	85(100%)	115(100%)	184(100%)	99(100%)	115(100%)	58(100%)	125(100%)	186(100%)	106(100%)	51(100%)

資料來源：米沢久子編集，《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1998年版)。

製表：助理李安瑜

在這十九期中，錄取最多的是第十七（後）期（1944年11月畢業），共錄取186人，最少的是第六期（1936年12月畢業），只有74名。這之中日本人占絕大多數，除第二、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八期外（第十九期日本人只有1名，是特例），錄取率都在90%以上，甚至在第七期占100%、第十七期占99%。日本人比例如此高的原因有四：1. 用日文考試。2. 對「日本國專門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畢業者或在採用前有畢業之希望者都可以應考。」3. 考試時（以1938年為例），必考科目滿洲基本法可用日本憲法取代，選擇科各法制科目得以日本國之



相當科目代之。4. 在日本高等文官考試本格考試（正式考試，即筆試）及格者，在滿洲國等同於高等文官考試中筆試通過。<sup>89</sup> 而在採用考試分為資格、採用考試後，通過日本高等文官的正式考試就等同於通過資格考試。<sup>90</sup> 至於朝鮮人以第十六期錄取 9%為最多，其平均錄取率高過臺灣，不過臺灣在第二期、第三期的錄取率分別是 6%、5%，高過朝鮮。至於其他，包括滿、蒙、俄等籍則第一期最高 8%，亦有沒有錄取的如第七期、第十六期。



說明：大同學院第一部第二期生合照，後排左二者為陳錫卿。  
圖片來源：陳許碧梧女士提供

<sup>89</sup> 〈文官考試規程〉，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222（康德 5 年 5 月 7 日），頁 195；〈關於依文官考試規程之認定及指定〉，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532（康德 6 年 5 月 26 日），頁 651。

<sup>90</sup> 〈將文官考試規程中修正〉，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954（康德 7 年 10 月 30 日），頁 613，第 4 點。

依據筆者整理之〈附錄 滿洲國大同學院臺籍畢業生履歷表〉中，第一部共有臺籍畢業生 25 人，以第二、三期每期有 5 人最多。舊、新第二部共有 4 人。<sup>91</sup>

## （二）前往滿洲的原因

### 1. 求職

筆者曾分析臺灣人前往滿洲的原因有四，一是求學，一是求職，一是作生意，另一是抗拒日本人對臺灣的統治。<sup>92</sup> 這些前去投考大同學院的臺灣人是去求職，但他們心中的想法是什麼？第五期的陳亭卿說出其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經濟科畢業後沒有工作，是他前往滿洲的主要原因。

1931~1933 年中，是世界經濟最恐慌的時機，無論是臺灣的大學畢業生，或者是日本的大學畢業生，這些甫自大學畢業的精英，在當時的環境下，無法在臺灣求生存；剛好那時東北地區有新建設的工作正在進行中，臺灣這批精英在臺灣經濟社會無法獲得容納的情況下，都往新建設的地區前去，因為那裡有新工作在等候，為了要生存下去，不得不離開臺灣到東北去。所以學校畢業後，我不怕任何艱難，帶著才新婚一個禮拜的夫人陳洪月桂（1935 年 3 月 12 日結婚）啟程前往東北。我們坐了四天三夜的船到朝鮮，再坐火車經過安東新義州、越鴨綠江，坐南滿鐵路的火車到新京，也就是現在的長春。……人說：瞎眼人不怕大槍，當時去滿洲國時也不知道有沒有地方可以住、工作有沒有著落，總是認為一定要離開臺灣。<sup>93</sup>

另一位畢業於臺北工業學校的洪在明，在接受筆者訪問時，也說出了求職與到一個和平新天地是他到滿洲國的主要原因。

---

<sup>91</sup> 這四人中，周文進、葉炳煌都是大同學院舊第二部第六期（1937 年 12 月畢業）；陳東興為舊第二部第七期（1938 年 6 月畢業）；吳福興為新第二部第二期（1941 年 4 月畢業）。

<sup>92</sup> 許雪姬著、杉本史子譯，〈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人の中国での活動：満洲国と汪精衛政権にいたる人々を例として〉，《中国 21（特集 台湾：走向世界、走向中国—政治經濟秩序の編成と再編成）》36（2012 年 3 月），頁 97-100。

<sup>93</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92。

昭和初期，日本政府對臺灣的統治算是很開放了，但是臺灣人尤其是知識份子，仍然沒有出路。一方面，學校畢業後找不到工作，難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有工作，日本人對臺灣人也有很大的差別待遇，在此情勢下，臺灣人只好往外求發展。適逢滿洲國成立（1932年），溥儀先當執政、後當皇帝，經過美麗的包裝，別上五族協和（紅、黃、藍、白、黑）的國旗，滿洲成了和平新天地，令人憧憬、嚮往。日本國民湧至下關搭上往大連的連絡船，船上熱鬧非凡，經過一夜抵達大連港，再乘著時速飛快的亞細亞號特快車到新京（長春）。不僅日本國民蜂擁而至，連臺灣人也紛從各地來到中國大陸東北開拓。<sup>94</sup>

不論是求職、求學、買賣、抗日無非都是為自己開創一片新的天地。也許有些人也意識到在臺灣，同一工作，日本人加俸 60%，而大感不平，想到號稱五族協和的滿洲也說不定。<sup>95</sup> 臺灣人如此想，那朝鮮人呢？以大同學院第十二期的尹富炳為例，他首先意識到在朝鮮，日本人無條件加薪 30%，對要就職的他而言，簡直是晴天霹靂！他覺得留在朝鮮沒有前途乃決定到日本留學，以法學為就學目標，但祖父認為如要學法根本不必去日本，如果到日本不學醫，將不給學費，因此乃改入岩手醫學專門學校，在那裏也感受到朝鮮人被差別看待。雖然畢業後暫時在日本行醫，但總覺當時的環境難耐，當時的朝鮮青年有集中到滿洲大同學院之想法。在他的認知中，大同學院是獨特的機關，其教育的方針是「人間教育」，因而抱著希望，與其在日本、朝鮮這樣狹小的地方生活，還不如到廣大的滿洲去。<sup>96</sup> 這就是尹富炳的理由。當時大多數臺灣人會到寒冷、和臺灣風土不同的滿洲，其理由也和尹氏大體相若。第十四期的謝報，說出了去滿洲國的另一個理由，那就是羨慕謝介石在滿洲當到駐日大使，在 1935 年臺灣舉行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時回到臺灣，受日本官方隆重的接待，因而興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感慨，遂決定前往滿洲。按謝報畢業於臺北工業學校機械科，畢業後考上日本文部省專科學

<sup>94</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洪在明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319-320。

<sup>95</sup> 蔡慧玉，〈日治臺灣的俸給令研究：明治建制、官制釋疑及臺灣基層行政〉，收於汪榮祖主編，《地方史研究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7），頁 159-160。

<sup>96</sup> 尹富炳，〈我的人生と大同學院〉，頁 25-27。

校檢定考試，派到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作，並沒有就職的困難。之後他到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再到日本三櫻工業株式會社東京總社工作，之後決定到滿洲國。<sup>97</sup> 謝報到滿洲後，也設法認識謝介石。

謝介石，新竹人，畢業於明治法律學校（今明治大學前身），1915年取得中華民國籍，他在滿洲國成立後，擔任第一任外交部總長，1934年任第一任駐日大使，在當時臺灣人中，不論在日本、臺灣或在中國，沒有一人職位超過他，他做為被羨慕的對象是可以想見的。他也多少協助到滿洲的臺灣人，如畢業於大同學院第二期的陳錫卿、第三期的徐水德，更重要的是謝介石介紹不少臺灣人進入外交部，如外交部特約醫生，後來當滿洲國皇帝私人醫生的黃子正，又如外交部秘書朱叔河，當然還包括謝的兒子謝喆生，和其妻舅王溫石。<sup>98</sup>

除了謝介石外，還有1932年滿洲國成立時即任執政府秘書官的蔡法平，<sup>99</sup> 福建人（亦為臺北州人），是板橋林家的外甥，曾就讀馬尾海軍學校，而後自學法律，後來臺為林家管帳，深受信用。<sup>100</sup> 他在陳寶琛（福建人，進士，曾任宣統帝侍講。張勳復辟時任內閣議政大臣，九一八事變後仍追隨溥儀到滿洲）介紹下進入滿洲國當秘書官，1938年升到簡任二等。<sup>101</sup> 在滿洲國也曾隨溥儀赴日答謝帝制成立，<sup>102</sup> 一家人遷住滿洲，大女婿楊蘭洲，<sup>103</sup> 二女婿洪在明，<sup>104</sup> 其小兒子蔡啟運，都在滿洲國任職。<sup>105</sup> 由上可知，由於臺灣人在滿洲國有看板人物，謝、蔡二人的得任高官，無疑地也是臺灣人到滿洲的原因之一。

<sup>97</sup>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丘慧君紀錄，〈謝報先生訪問紀錄〉，頁196。

<sup>98</sup>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2007年9月），頁63、93-98。

<sup>99</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74（大同元年12月10日），頁127。

<sup>100</sup> 黃富三、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林衡道、蔡啟恒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1992年12月7日，於臺北市YMCA。按蔡啟恒為蔡法平之子，蔡法平並未受太多的正規教育，但《滿洲國名士鑑》說他畢業於馬尾海軍學校，又留學日本。參見內尾直昌編，《滿洲國名士鑑：康德元年版》，頁84。

<sup>101</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355（康德5年10月12日），頁411。

<sup>102</sup> 「外國元首並皇族本邦訪問關係雜件 滿洲國ノ部，溥儀皇帝御來朝ノ件」，〈滿洲國皇帝陛下扈從官（昭和10年2月12日）〉（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L.1.3.0, 2-6-1。

<sup>103</sup>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曾金蘭紀錄，〈楊蘭洲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148-150。

<sup>104</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洪在明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1999年7月8日，2000年4月10、28日、5月18日、6月8日，2001年3月2日、4月27日，於臺北市農安街洪宅。惟兩人後來離婚。

<sup>105</sup> 蔡啟運於1942年任衛生技術廠高等官試補，在北安省立克山國民高等學校辦事，參見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2500（康德9年9月17日），頁207、209，戰後在東北未回臺。

## 2. 同樣資歷在滿洲的官等與薪資比日本高

除了滿洲國有不少工作機會，而且有謝介石、蔡法平兩人做為看板，成為最吸引臺灣人到滿洲的原因外，更關鍵的是，在滿洲就職無論官等和薪資，都比在日本、臺灣高。

如果進一步分析，這批經過大同學院訓練的高等官臺灣人中，到滿洲國滅亡的 1945 年為止，最高的官雖只是薦任二等，只要再經薦任一等，即可進入簡任官。誠如前述，高等官包括特任、簡任及薦任官，特任官先不計外，在滿洲國剛成立的 1932 年，簡任官為高等官一、二等，薦任官為高等官三等至八等。至成立帝國的 1934 年後則簡任官不變，但薦任官分成一等至八等。<sup>106</sup> 到 1938 年時有了改變，亦即文官令發布前薦任官的官等，原為一等的仍為一等，二等的改為一等，表三三、四等改為二等，五、六、七、八等改為三等，<sup>107</sup> 統一了文官令發布後的官等（表三）。在臺灣人的資料中，升到薦任官二等的有黃瀛澤、黃清塗、黃千里、徐水德、吳昌禮、陳亭卿、邱昌河等人（部分人資料不足），這其中擔任行政官、司法官較多，而林永倉和王森井則是技術官。<sup>108</sup>

至於他們的薪俸為多少？在大同學院受訓時一個月有 150 元津貼。<sup>109</sup> 就職後的薪水如何？依 1934 年〈高等官官等俸給令〉的規定，薦任官的俸給共分 12 級，薦任一等的依第 1 號，二等的依第 2 號，三等的依第 3 號，四等的依第 4 號。<sup>110</sup> 至 1936 年，依勅令第 50 號〈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修正〉中，將薦任二等的 2 號月薪增加一級是為 13 級，是 135 元；<sup>111</sup> 到了 1938 年第 2 號又增為 19 級，即自 14 級至 19 級。<sup>112</sup> 到 1942 年廢除薦任官薪級的 1、2 號，全以 1 號薪資給予，共分 20 級。1 級月薪 520 元，20 級月薪 115 元。<sup>113</sup> 以陳亭卿來說，1943 年 12 月他

<sup>106</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元年 6 月 30 日），頁 510-517，勅令第 89 號，第 1、25 條。

<sup>107</sup> 〈關於依文官令第一百十八條規定之現職者之特例之件〉，頁 35，第 23 條。

<sup>108</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2275（康德 8 年 12 月 6 日），頁 137；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2504（康德 9 年 9 月 23 日），頁 270。

<sup>109</sup>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蔡西坤先生訪問紀錄〉，頁 173。

<sup>110</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元年 6 月 30 日），頁 521，勅令第 89 號，第 1、25 條。

<sup>111</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616（康德 3 年 4 月 9 日），頁 163-164。

<sup>112</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 5 年 9 月 22 日），頁 16。

<sup>113</sup>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942（康德 7 年 10 月 15 日），頁 318。

表三 滿洲國文官官等沿革

發布時間	滿洲國文官		官等	級俸（以月俸為主）	任免敘等	來源
1933/6/28	特任官			2級，年俸	執政	1. 敕令第四十二號〈暫行文官官等俸給令〉，《滿洲國政府公報》19（大同元年6月28日），頁1-2。 2. 敕令第八十二號〈暫行文官官等俸給令中改正〉，《滿洲國政府公報》44（大同元年9月12日），頁3。
	高等官	簡任官	高等官一至二等，共二等	8級，年俸	執政	
		薦任官	高等官三至八等，共六等	18級，當年追加至26級，年俸	國務總理→執政	
	委任官		委任官共五等	30級	本屬長官	
1934/6/30	高等官	特任官		2級（依官職又有不同）		敕令第八十九號〈高等官官等俸給令〉，《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元年6月30日），頁29。
		簡任官	簡任官一至二等，共二等	5級（依官職又有不同）		
		薦任官	薦任官一至八等，共八等	12級，分四號		
	委任官		委任官共五等	17級，分二號		敕令第九十號〈委任官官等俸給令〉，《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元年6月30日），頁29-33。
1938/5/7	高等官	特任官		依官職不同		1. 敕令第九十五號〈文官令〉，《滿洲國政府公報》1222（康德5年5月7日），頁175-211。 2. 敕令第二百三十號〈文官給與令〉，《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5年9月22日），頁1-24。
		簡任官	分二等	7級	國務大臣奏請	
		薦任官	分三等	19級，分二號	國務大臣奏請	
	委任官		31級，分三號	本屬長官		
	試補	試補高等官		9級		
試補委任官			13級，分三號			

製表：助理陳雅苓

領的是10級俸，那就是270元，吳昌禮到1945年領的是8級俸，就是315元，徐水德到1945年2月領的是7級俸，就是340元，邱昌河在1943年8月領的是12級俸的230元，謝報領420元，領的是4級俸。<sup>114</sup>除了本俸外，還有職務津貼（以職務的性質、繁閒）、冬期津貼（採暖費，全國分三級，支給一至二成的費用）、勤務地津貼（依生活難易、治安、衛生、教育等生活條件，將全國分為五級）、在外津貼（1940年1月以後物價騰貴，對生活困難的委任官職員以下之臨時支給），<sup>115</sup>以及所謂的語言津貼。

<sup>114</sup>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丘慧君紀錄，〈謝報先生訪問紀錄〉，頁200。

<sup>115</sup>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下卷·各論》，頁32。

為了鼓勵日系及滿系成為能雙語的人，滿洲國設有語學檢定考試，列入考試範圍的語言是滿洲語、日本語、蒙古語，應試資格為在滿洲國任職的，只要經各官署長推薦，日系有考滿洲語與蒙古語的資格，其他人只有考日本語的資格。第一次舉行在 1936 年 8 月上旬到 9 月下旬，舉行的地點分成滿洲語、日本語、蒙古語，考場不盡相同。考試分口試和筆試，筆試分為解釋（滿洲語考試為滿文譯日文、日文譯滿文）、作文及筆錄；口試分會話和解釋，考試結果分成特、一、二、三等，各給語言津貼（表四）。大同學院有兩個臺灣人考過滿洲語（中文），陳錫卿考上第一等，<sup>116</sup> 林永倉在新京工業大學就讀，因腳傷入院一個半月，期間努力學滿洲語，一出院就考過第三等，第二年再考上二等。<sup>117</sup>

表四 滿洲國各等語言津貼表

等級	薦任官及委任官	委任官待遇者	附註
特等 能通流暢日語文語及公文程度	20 元（月）	15 元（月）	給 5 年
一等 能通口語文語及公文程度	15 元	10 元	給 2 年
二等 能通口語及簡單之文語程度	10 元	6 元	給 2 年
三等 能通日常簡單之口語程度	6 元	4 元	給 1 年

資料來源：〈發給語學津貼規則〉，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659（康德 3 年 6 月 1 日），頁 2-3；〈語學檢定考試〉，收於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681（康德 3 年 6 月 27 日），頁 435。

此外，高等官的薪水是每年調升 15 元，若遇拔擢則升二倍，蔡西坤說他在滿洲待四、五年的時間裏，待遇總共升了七倍，日子可以說過得很輕鬆。<sup>118</sup> 陳亭卿也說，臺灣人到滿洲有好處，就是享有日本人的生活待遇，但這也僅限於高等官，一般的屬官則沒有這等優待。接著說到「在我們臺灣本島，臺灣人沒有享受一樣的待遇，只拿日本人六成左右的薪水，我們得 40、60 元，他們就可拿 90、100 元，但在東北，則一樣，照學歷拿薪資。」<sup>119</sup> 以下看看當時滿洲國的薪情如何。

<sup>116</sup>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吳左金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 5 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 102。

<sup>117</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永倉先生訪問紀錄〉，頁 350。

<sup>118</sup>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蔡西坤先生訪問紀錄〉，頁 180。

<sup>119</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頁 298。依蔡慧玉的研究，1921 年修改「臺灣總督府職員加俸支給細則」後，確定了「日本高等文官加俸百分之五十，判任文官加俸百之六十」的支給標準。參見蔡慧玉，〈日治臺灣的俸給令研究：明治建制、官制釋疑及臺灣基層行政〉，頁 159-160。

表五 1934年時日本奏任官與滿洲國薦任官之年俸比較（以二號為例）

級俸	日本奏任官（高等官四等乃至八等）	滿洲國（薦任官二等）
一級	3,400（日本円）	390×12=4,680（滿洲國幣）
二級	3,050	365×12=4,380
三級	2,770	340×12=4,080
四級	2,420	315×12=3,780
五級	2,150	290×12=3,480
六級	1,820	265×12=3,180
七級	1,650	240×12=2,880
八級	1,470	215×12=2,580
九級	1,300	195×12=2,340
十級	1,130	175×12=2,100
十一級	1,050	160×12=1,920
十二級	--	145×12=1,740
官職	理事官、統計官、翻譯官、編修官、稅務官、稅關鑑定官、警視、學校教諭、圖書館長、公立醫藥機構之醫官、州廳的地方理事官、地方警視等。	主要為院廳層級的事務官、秘書官、理事官、技佐、大同學院教授與學監等。
法令依據	敕令第134號〈高等官官等俸給令〉，1910年3月。	敕令第89號〈高等官官等俸給令〉，1934年7月。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昭和9年版），頁74-75。	《滿洲國政府公報》號外（康德元年6月30日），頁513-515、521。

備註：1. 滿洲國部分原為月俸，為便於比較乃轉為年俸。

2. 當時日本奏任官為高等官三等至九等，滿洲國薦任官一等至八等。

製表：助理陳雅苓

以1934年時日本奏任官與滿洲國薦任官之年俸比較，如表五，可發現同樣是十一級，單就本薪在滿洲國一年可多拿870元，平均每月較在日本（包括臺灣）多72.5元。在此亦有必要說明滿洲國和日本國幣值是否相等，比較才有意義。滿洲國一開始日系職員的薪水是日本內地薪水的二倍到三倍。就幣值而言，當時滿洲國幣100元對日本円60円，但之後因美國銀政策的關係，銀價飛騰上升，變成滿洲國幣100元等於日本円120~140円，造成滿洲國官員的薪水加了六~八成，而使滿洲國總務廳不得不對日系人員減了四成俸以為因應。但之後受到反彈，乃減為二成六。<sup>120</sup> 即使經過減俸，其本俸仍比日本官員高，更何況1935年時日本、滿洲國發表兩者的幣制等值，<sup>121</sup> 因此表五的比較就有意義。

<sup>120</sup>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上册》，頁27-28。

<sup>121</sup> 梶倉正一，《滿洲中央銀行十年史》（新京：滿洲中央銀行，1942），頁324。



### （三）戰後臺籍的大同學院生之遭遇

1945年8月9日蘇聯進攻滿洲國，中央政府往安東通化大栗子移轉，8月16日日本下令對蘇停戰，8月18日溥儀退位，隔日被蘇軍逮捕，滿洲國正式劃下休止符。<sup>122</sup> 面對滿洲國的崩潰，畢業於大同學院者，除了原本就是中國人外，日本、朝鮮、臺灣人莫不開始了回歸故鄉的打算。由於東北離臺灣最遠，戰後國民政府無力派船前往接回，因此乃設法集中到瀋陽，隨後組織同鄉會，向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 UNRRA）亞東分署請派船、安排就學、職業，並透過廣播讓臺灣的家人安心，同時請報界公布臺人的姓名，當時約有 3,000 多人滯留東北等待救援。<sup>123</sup> 經交涉前後分成五梯次回臺，除了一些特例，或娶滿洲人為妻者外，在東北的臺人大抵在 1946 年底回到臺灣，但臺灣已非日本統治，中華民國政府、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旅外的臺人，祭出〈懲治漢奸條例〉，<sup>124</sup> 使擔任「偽滿小吏」的臺灣人惴惴不安。以長春臺灣省同鄉會長郭松根為名所呈請的〈為呈請指定輪便接回東北臺胞由〉，指出東北臺人未曾利用日籍，而有仗勢欺人之事，只因被迫，勉就「偽滿小吏」以表白心志，希望能獲政府接納。<sup>125</sup> 當時除了原滿洲國駐汪政權濟南總領事吳左金以漢奸罪名被捕、羈囚 297 天，才以不起訴處分外，<sup>126</sup> 其餘未有遭逮捕者。除了回來時間較晚，就職不利外，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在 1947 年 10 月訂出〈辦理臺灣省考試注意事項〉四條，不僅在東北就學者要經教育部相關單位甄審通過才有參加國家考試資格，還不承認過去擔任公職的年資。<sup>127</sup>

何以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後頒布此注意事項，主要是有滿洲經驗者部分人士在二二八期間，有些作為令政府側目，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來說，大同學院第五期

<sup>122</sup> 松井孝也編集，《滿州：日露戦争から建国・滅亡まで》（東京：毎日新聞社，1978），頁 89，〈年表〉。

<sup>123</sup> 由長春臺灣省同鄉會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臺灣分署署長錢宗起，請求派船接回臺灣人。參見〈為呈請指定輪便接回東北臺胞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sup>124</sup> 朱金元、陳祖恩，《汪偽受審紀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 145-161。

<sup>125</sup> 〈為呈請指定輪便接回東北臺胞由〉。

<sup>126</sup>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吳左金先生訪問紀錄〉，頁 115-117。

<sup>127</sup> 劉昕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第七卷·民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 421。

的陳亭卿，回臺後在臺灣廣播電台擔任文書股總幹事。<sup>128</sup> 他號召有東北經驗者30多人在中山堂開會，由第三期的徐水德任主席，陳亭卿當司儀，討論管理臺灣的問題，預備隔天再開會，但當晚國軍已開到基隆，遂中止。徐水德也曾和第二期的歐陽餘慶與黃炎生被推為臺灣青年幹部，一起去見陳儀。<sup>129</sup> 陳亭卿在事件中因有大批民眾擁入電台播音，事後遂以「煽動民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判刑2年，<sup>130</sup> 在關了三個月後就出獄。第八期的蔡傑川（誠傑）因二二八事件逃往日本，定居神戶迄今。<sup>131</sup>

所謂〈辦理臺灣省考試注意事項〉有四：一、凡曾在收復區偽組織或其所屬機關團體擔任職務，經依懲治漢奸條例判罪，或雖未依該條例判罪而其擔任職務經法院認為屬實者，均不得應考。如矇混應考，一經查明，考試成績即認為無效。其於及格後始經發覺者，即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二、應受前條限制之偽職人員，其在任偽職期間內，如曾為協助抗戰工作，或有利於人民之行為，或其職務係為專門技術，經各部隊最上級指揮部、國防部、中央黨部、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最高級行政機關證明屬實，並咨送考試機關有案者，准免除此項限制，仍得應考。三、曾在收復區偽組織或其所屬機關團體任職之年資，均不予計算。四、凡收復區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須呈繳甄審及格證書，始准報考。至東北區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或收復區高級中學畢業生及以上二區域內抗戰期間之日本留學生，在教育部或各省市教育廳局甄審結果未揭曉前，得暫准報名應考；但須於報名時呈繳參加甄審登記之證件收據，作為已參加甄審之證明。如甄審成績不及格，其所應考試成績認為無效。試務處於報名時，應特別注意；並於報名完竣後將東北區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及抗戰期間之日本留學生應考人，列冊報由本會轉向教育部查詢。其係收復區高級中學畢業者，即由試務處逕向各該省市教育廳局查詢，於考試完竣後一個月內，將查詢結果函報本會。<sup>132</sup> 使在滿洲國有公職經驗者，望

<sup>128</sup> 許雪姬訪問、王美雲紀錄，〈陳亭卿先生訪問紀錄〉，頁304。

<sup>129</sup>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徐水德先生訪問紀錄〉，頁247。

<sup>130</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428。

<sup>131</sup>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涂南山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頁11、28。筆者於2005年到神戶演講時，曾經人介紹，但未及做訪談。

<sup>132</sup> 劉昕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第七卷·民國〉，頁421。

公職而卻步。

就在發布考試注意事項後，1948年發生了所謂的愛國青年會案。此即大同學院畢業生（畢業於建國大學）的李水清、黃山水這兩位第十七期生，與同屆建國大學的林慶雲，及第二期的游海清、<sup>133</sup> 第四期的孫順天都涉入愛國青年會案。<sup>134</sup> 其中李水清判2年、黃山水被判刑4年。<sup>135</sup>

筆者因黃山水的判決書中有「但查該被告與林慶雲、李水清過去同期同學，返臺後復交往頗密，而此項非法組織為林、李二人所主持……」，因此又稱之為「滿洲建大案」。而當時滿洲國最高學府建國大學的畢業生（6年畢業），都必須先入大同學院接受3個月的訓練，<sup>136</sup> 但除了第一期外，到第二期日本人都學徒出陣、當兵去了，剩下來的滿、蒙、白俄的畢業生才入大同學院，<sup>137</sup> 而第三期畢業生都是滿系（只除了北岡憲一郎為日系外），在1945年7月也入大同學院，接受職前訓練。<sup>138</sup>

雖然曾如上述，面對新的時代這批在「偽政權」接受訓練、教育的大同學院畢業生，其在戰後的中國都有一段十分艱苦的歲月，<sup>139</sup> 回到臺灣後也多有磨難，但這些經過特別教育的畢業生，在往後亦出了一些人才。以韓國來說，大同學院第十五期的崔圭夏擔任過韓國的大統領，全仕龍歷任大邱檢事總長（首席檢察

<sup>133</sup> 據刑事判決書中，其罪名為「……共同組織愛國青年會，以臺灣自治與獨立運動為宣傳共產，吸收黨員之掩護，陰謀於共軍易侵臺灣時，以二二八暴動方式策應匪軍，赤化臺灣……」。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民國三十九年度訴字第第六號（1950年），（臺北：司法院藏），時未公開。

<sup>134</sup> 原來黃山水亦判刑3年，因二度上訴被改為判刑4年、褫奪公權則仍然維持3年。參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民國四十一年度訴字第一號（1952年1月24日），（臺北：司法院藏），時未公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民國四十一年度訴字第一號（1952年9月26日），（臺北：司法院藏），時未公開。

<sup>135</sup> 許雪姬，〈滿洲經驗與白色恐怖：「滿洲建大等案」的實與虛〉，收於許雪姬主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臺北：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頁10、13。

<sup>136</sup> 劉之謙，〈泯恩仇〉，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紀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的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錄〉，頁117。

<sup>137</sup> 張玉斌，〈緣（えにし）〉，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紀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的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錄〉，頁127。

<sup>138</sup> 楊世基，〈農安行軍記〉，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紀念出版委員會編，〈友情的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錄〉，頁179。

<sup>139</sup> 由大同學院同窓會出版的《友情的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錄》一書，中國人執筆的有22名，其中大半不提戰後情形，而在談過去中日交流史，或說如何「一笑泯恩仇」，及加強今後的中日交流史。劉之謙則談到在中國的同窗嘗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難，做為也是無辜人民的大同學院畢業生，遭遇了難以想像的艱苦。見劉之謙，〈泯恩仇〉，頁119。

官)、民正黨國會議員,金錫宇任韓國法政大學教授,韓重健為水產業界權威,任韓國水產技術協會會長,李允模原任特許局長,卸任後開辦全韓國最大的特許事業事務所,並在1980年取得韓國第一個特許法博士,也到延世大學開「工業所有權法」的課。如上,除了崔圭夏是十五期外,其餘都是十八期,<sup>140</sup>其表現確是不凡。

在臺灣,最幸運的大同學院畢業生首推陳錫卿,他於1947年參加縣長考試,列第二名,4月擔任彰化市長(第一名何舉帆任屏東縣長),而後任官派彰化縣縣長4個月,再競選成功連任彰化縣長,1960年起任省民政廳長,兼彰化銀行常務董事。<sup>141</sup>其餘畢業生也憑其實力續任公職,如黃瀛澤任臺灣省農林廳新竹區農林改良場場長、新竹縣建設局局長,黃清塗、黃千里、林永倉、吳昌禮等人在臺北市政府工作,是臺北市政府東北幫的成員。<sup>142</sup>洪利澤、徐水德在臺灣省農林廳,進入銀行界的有陳亭卿、陳茂經。走入業界的有廖行貴(一度擔任高雄工業學校校長)、李水清、謝報、黃山水、吳福興,擔任律師的有溫錦堂、蔡西坤,當醫生的有周文進,當省議員的有葉炳煌。此外許坤元亡於長春,王銘勳、蔡啟運留在東北未回臺灣,其他人則查不到相關事蹟(參見附錄)。

綜上,臺籍的大同學院畢業生中原來在滿洲國都已是薦任級的高等官,假以時日,與時俱升,也許當一輩子的公務人員,然因日本戰敗、滿洲國滅亡,使他們的人生起了大變化,他們必須面對漢奸、戰犯審判,未經甄審通過不能參加國家級考試,過去在滿洲國公務員年資不算,儘管面對戰後在臺的險峻環境,他們畢竟是有實力的,故亦能在戰後為自己開闢一片天,更幸運的是他們未被漢奸審判,亦能證明臺灣人到中國東北的以菁英為多,有異於在華南的臺灣籍民,在戰後一時間被列入漢奸交福建高等檢察處偵辦的就有96名。<sup>143</sup>

<sup>140</sup> 李允模,〈私の今昔〉,收於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会編,《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頁176-178。這篇是李允模1981年10月10日寫給十八期生文集〈天翔るべき〉的稿件,因1983年11月過世,故放入此篇。

<sup>141</sup> 中西利八編纂,《滿華職員錄》,頁913。另依陳錫卿家屬提供的〈陳錫卿先生簡歷〉,在相關時間點上有落差,在滿洲國時代、上海時代的經歷,應以《滿華職員錄》為準。

<sup>142</sup> 有滿洲經驗的臺灣人在戰後成立「東北會」,而在吳三連任臺北市長時代,用了一些有滿洲經驗的入臺北市政府,如楊蘭洲、林永倉、黃千里、黃瀛澤、吳昌禮、洪智默等人。

<sup>143</sup> 第三戰區金廈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編,《閩臺漢奸犯罪紀實》(廈門:江聲文化出版社,1947),頁117,〈七、閩司法機關判奸經過(轉載廈門《江聲報》)〉。

## 五、結論

滿洲國於 1932 年成立後，並未發布文官令，一直到 1938 年才公布。公布後凡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者，即入大同學院訓練半年或一年，即能任「高等官試補」（準於高等官），而被安插在機關實習，經過一年以上即可參加高等官適格考試，成為滿洲國政府的薦任官，之後再參加登格考試升等。臺灣人因在臺灣機會有限，滿洲國的待遇較佳，乃前往滿洲國參加考試，由資料所知考上大同學院第一部（大學或同等學力）的臺灣人共 25 人，第二部則有 4 人。比例誠然不高，滿洲國政府是否對臺籍人士限制呢？如表二，第二、三期生各有 5 名畢業外，其餘或沒人考上，或者 1、2 人，但並未在相關公報中發現類似限制臺人名額的規定，這是取得高等官的終南捷徑，應該相當難考。有關日治時期臺人通過日本高等文官考試行政科、司法科者早已有多人研究過，<sup>144</sup> 但尚未注意及在滿洲國體制下的高等官。

本文鎖定大同學院這一訓練官吏的機構開始，藉由過去受訪者的回憶以及《滿洲國政府公報》互相配合，來描述大同學院的角色。1938 年〈文官令〉頒布後的變化，到 1945 年 8 月為止，臺灣菁英在滿洲國任官、就職的情形，並簡述往後的情況。上述這 29 名，在臺灣機會較少，但到滿洲國，既能經考試取得一官半職，薪水優厚，在滿洲國不但沒有受到日本人的壓迫，反而成為統治集團之一員；再加上是漢人，又和當地人透過學緣、職緣建立比日本人與當地人更親密的關係，成為中、日之間的橋樑，因而在 1945 年 8 月，當臺灣人再由日本籍變成中國籍時，不但未受當地人的迫害，反而受到協助，受到漢奸審判的也非常少。相對於在華南、華中的臺灣人，顯出不同的情況。絕大部分在東北的臺人都安然回到臺灣，雖然回臺後面臨不計年資、未甄審及格不得參加高等考試的困境，但終能突破困境，發揮所長，共同建設臺灣。

---

<sup>144</sup> 研究者有吳文星、蔡慧玉和劉恆奴等。

以日治時期臺人通過日本高等文官考試之行政科、司法科者，除了擔任開業律師外，在日本或臺灣甚至南洋（如林益謙任爪哇司政官）<sup>145</sup> 任職過高等官者，目前所能掌握的有 36 人，<sup>146</sup> 而大同學院的臺人畢業生任「高等官試補」的至少有 28 名，<sup>147</sup> 若再加上滿洲國其他部門的高等官，日治時期臺灣人任高等官的人數就會增加許多（已知 58 名），<sup>148</sup> 就這方面來看，有其意義。在處理完大同學院後，任職滿洲國大陸科學院、外交部與在各大學任教的臺灣人，也值得注意，這將是下一波研究對象。山室信一曾在〈殖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滿洲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一文中指出臺灣人有機會到滿洲發展，即是帝國內部人才周流的現象之一。<sup>149</sup> 戰後回到臺灣後因已習得北京話，且回臺時經過天津，與吳三連認識，在吳三連當臺北市長時，被陸續引進臺北市政府，而有「東北幫」之稱。這其中包括大同學院的畢業生黃清塗、黃千里、吳昌禮與林永倉。

同是大同學院畢業的日人、中國人、朝鮮人、臺灣人，在戰後大家拋棄國仇家恨，每年大都在春、秋各舉行一次同學會，分別在東京、九州、北京、臺灣、長春、哈爾濱等地召開，<sup>150</sup> 繼續搭築友誼的橋。1998 年編輯出版的《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就是校友們努力的成果，只是大同學院已隨著滿洲國而消失，且隨著歲月變化，該院畢業生已愈來愈少。80 年前的這段往事若非藉此機會重述，即將湮沒在歷史的大河中。

<sup>145</sup> 1944 年 5 月，林益謙被任為陸軍司政官。參見《臺灣總督府官報》639（昭和 19 年 5 月 10 日），頁 43。在明裕文化基金會的董事簡介上，1944 年 6 月他被派往印尼，擔任軍政管部財務部專賣局長兼財務部金融課長。參見〈創辦董事會・董事簡介〉，「財團法人明裕文化基金會」，下載日期：2012 年 8 月 3 日，網址：[http://www.mingyu.org.tw/mingyu1\\_5.asp](http://www.mingyu.org.tw/mingyu1_5.asp)。

<sup>146</sup> 筆者依據現有資料整理之「日本高等文官試驗合格者人數統計表（1894-1943）」及「日本高等文官試驗臺籍合格者履歷表」，統計出在日治時期日本高等文官行政科試驗合格的臺灣人有 33 名，司法科（含辯護士試驗）有 92 名；具高等官資歷者，行政科有 20 名，司法科有 26 名，減去重複者後，合計 36 名。

<sup>147</sup> 周文進轉到朝鮮平壤習醫，故少 1 名。

<sup>148</sup> 依助理李安瑜整理之「在滿洲國臺灣人高等官一覽表」（未刊稿）初步估計至少有 58 名。部分名單尚在確認中。

<sup>149</sup> 山室信一，〈殖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滿洲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頁 181-184。

<sup>150</sup> 〈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頁 306。



說明：滿洲國新京大同學院諸位為臺灣佛教中學林（今臺北市泰北高級中學）善慧上人送別攝影紀念（癸酉年〔1933〕6月25日）。由左至右：黃瀛澤、黃千里、江善慧、趙鴻謙、陳錫卿、黃清塗，攝於新京。

圖片來源：陳許碧梧女士提供

## 附錄 滿洲國大同學院臺籍畢業生履歷表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1	黃瀛澤	臺灣 新竹	1907-?	臺北帝大 農學部農 業工學科 (1932.3)	第二期 (1933年10 月畢業)	1933年10月實業部屬官，在農林司辦事，委任二等。 11月任產業部農事試驗場克山農事試驗場技佐。 1934年在農務司辦事，委任二等，7級俸；9月改6級俸。 1936年5級俸。 1937年轉任農事試驗場技佐，薦任六等，派在克山農事試驗場辦事。 1938年給7級俸，11月給13級俸。 1939年5月，任產業部技佐，敘薦任三等，派在農業司辦事。 1940年5月1日委囑為統計講習所第四回講習講師。6月1日任興農部技佐，派在農政司辦事，6月16日任興農部技佐，兼任總務廳技佐，敘薦任二等，派在統計處辦事。 1944年任興農部技佐，派在大臣官房辦事。	任臺灣省農林廳新竹區農林改良場場長、新竹縣建設局局長。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陳嘉樹、陳高紘夫婦、陳正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8】。 【9】、【25】、【30】。 【26】，大同第248號、康德第19號、第180號、第747號、第927號、第1169號、第1372號、第1529號、第1835號、第2133號、第3162號。
2	黃清塗	臺灣 基隆	1912-1994	日本明治 大學政經 科	第二期 (1933年10 月畢業)	1933年，為外交部屬官，委任四等，在通商司辦事。 1937年給9級俸，派在外交部政務廳辦事。 1938年為外交部屬官，給12級俸，年底為外務局試補高等官。 1940年以外務局高等官試補的身份，派在滿洲國駐汪記中華民國通商代表部。 1941年派在北京通商代表部辦事。 1942年通過高等官適格及特別適格登格考試及格。 1943年2月為外務局事務官，敘薦任三等、給13級俸，派在政務廳辦事。 1945年3月陞敘薦任二等。	1953年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工商科科長，二年後陞任課長。 1960年起擔任第七任松山區區長，1967年卸任。是年臺北改為直轄市後，轉任第一任松山區區長，一個月後轉任延平區區長，直到1977年卸任。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黃陳波雲女士訪問紀錄〉，收於【8】。 【11】、【12】、【14】。 【15】（1968、1971）。 【26】康德第248號、第1001號、第1178號、第1400號、第1592號、第1804號、第2240號、第2336號、第3210號。
3	黃千里	臺灣 臺南	1909-?	日本早稻 田大學英 文科 (1933)	第二期 (1933年10 月畢業)	1933年11月為文教部屬官，在禮教司辦事，委任二等。 1935年5級俸。 1939年7月任民生部事務官，在社會司辦事，薦任六等，領11級俸。 1941年7月任民生部理事官、總務廳參事官。 1942年任民生部理事官，派在勞務司辦事，薦任三等。 同年任勞務司輔導科長。	1950年2月任臺北市公用事業管理處處長。1952年7月該處改為公共汽車管理處與自來水廠，改任自來水廠廠長。 1954年11月調任工務局局長，一直到1956年2月卸任。	許雪姬訪問、紀錄，〈洪智默先生訪問紀錄〉，2000年6月18日，於洪宅，未刊稿。 〈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收於【8】。 〈林永倉先生訪問紀錄〉，收於【8】。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亦任大同學院同窓會本部幹事。 戰後曾任阜新市市長。		【23】、【29】。 【26】，大同第 261 號，康德 第 328 號、第 976 號、第 1725 號、第 2167 號、第 2326 號。
4	陳錫卿 （陳錕 鋁）	臺灣 南投 （竹 山）	1907-1985	臺北帝大 文政學部 法學科 （1933）	第二期 （1933 年 10 月畢業）	1933 年 10 月任滿洲國文教部學務司專門教育科屬官。 1939 年派任安東省公署視學官，敘薦任六等，給 8 級俸 及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臨時委員，1941 年 6 月改任北安 省文教科長，1 年半後再調回文教部。而後到上海任上 海特別市政府參事，調在周佛海市長處擔任秘書，一直 到戰爭結束。	回臺後，先擔任臺灣省紅十字會 專員，之後任農林廳處長徐慶鐘 的機要秘書。 1947 年參加縣長考試，得第二 名，4 月分發就任彰化市長，任 期 2 年 8 個月，之後任官派的彰 化縣縣長 4 個月。 1951 年當選實施地方自治後第 一任彰化縣縣長，又連任二次， 前後任職 9 年。 1960 年起任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長 6 年半，並兼彰化銀行常務董 事。1967 年被指派為國民黨中 央黨部副秘書長，兼中國電視公 司常務董事、臺灣土地開發公司 常務監察。 1970 年任齊魯公司董事長兼臺 灣省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最後 以省政府顧問、行政院顧問退 休。	【6】、【7】。 【17】，1933 年 3 月 8 日，夕 刊，第 4 版，〈臺北帝大卒業 生 開島外進出之途 大同 學院採用三名〉。 【26】，第 1461 號。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陳 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收於 【35】，頁 267，〈附錄：陳錫 卿先生簡歷〉。
5	歐陽慶一 （歐陽餘 慶）	臺灣 臺北 （淡 水）	1905-?	臺北師範 學校本科 （1924）、 日本法政 大學法律 學科	第二期 （1933 年 10 月畢業）	1933 年 10 月旋任國務院法制處委員，同處屬官、總務 廳屬官同事務官。 1938 年任總務廳法制處參事官，兼大同學院教官。		【5】、【16】。
6	洪公川 （洪利 澤）	臺灣 臺北 （淡 水）	1909-?	日本中央 大學法學 部英法學 科（1933）	第三期 （1934 年 10 月畢業）	1934 年 10 月任黑龍江省公署屬官，委任三等，5 級俸。 1936 年改在龍江縣辦事。 1937 年陞敘委任二等，給 4 級俸。同年給 6 級俸。 1938 年任省高等官試補，派在龍江省長官官房辦事，給 4 級俸。	戰爭結束後回臺，由徐水德介紹 進入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工作， 1951 年 11 月 5 日任為農林廳秘 書，1955 年 7 月 30 日派為臺灣 省農業加工實驗場秘書，1959	【1】、【5】。 〈「外務省記錄」・昭和戰前 期・旅券史料〉（東京：日本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J,2,2,0,J13~7，昭和 9.4-9.6，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1941年任市事務官，派在奉天市財務處辦事，敘薦任三等。 後任參議府秘書局參事官。	年2月13日派為農林廳專員， 1973年9月10日再任農林廳秘書，後於1975年6月4日從農林廳秘書退休。	旅 109,523.241.662。 【26】大同第282號，康德第718號、第913號、第1069號、第1400號、第1585號。 【8】，頁249。 《總統府公報》，第320期、第623期、第1002期、第2623期、第2894期。
7	廖行貴	臺灣 臺南	1907-?	日本大阪 帝大工學 部機械科	第三期 (1934年10 月畢業)	1934年11月在交通部鐵路司鐵道科服務。 1938年任交通部遼河治水調查處技佐，而後轉任交通部技正港口科長。 在東北期間與陳重光合作經營消防器材，頗為活躍。	1947年2月17日任職高雄工業 學校校長，二二八事件後去職， 罪名「任學校學生聯絡團員」。 一度在臺灣省農會機械廠當總 經理。曾製造臺灣第一台家庭用 淨水器。	【4】、【18】、【30】。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徐 水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 【8】。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陳 嘉樹、陳高紘夫婦、陳正德先 生訪問紀錄〉，收於【8】。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余 錫乾先生訪問紀錄〉，收於 【8】。 《國聲報》，1947年2月11 日，〈高雄工業校校長 李鍾 淵革職 後任校長廖行貴氏 充任〉。
8	徐水德	臺灣 桃園	1905-?	臺中商業 學校 (1925)、 日本大阪 市立商科 大學金融 科 (1932.3)	第三期 (1934年10 月畢業)	1932年畢業後到新京找工作。 1933年入情報處任出納，而後學習中文，考上大同學院。 1934年10月畢業後入財政部任屬官，在理財司辦事， 委任三等，給7級俸。 1936年兼任稅關事務官佐，派在營口稅關辦事，敘委任 三等。 1939年經濟部，稅關屬官，派在金融司辦事，薦任六等， 給11級俸。 1940年任經濟部事務官，給14級俸。 1942年為專賣總局理事官，兼任經濟部理事官，薦任三 等，翌日改為經濟部理事官，派在商務司辦事，再更動 為經濟部商務司調查科長。該年6月4日派為企畫委員 會（綜合立地計畫委員會）特別幹事。	1946年9月回臺，因失業而經 營鐵工廠。 1948年進入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服務，3年後到檢驗局任職，升 到副局長，而後退休。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徐 水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 【8】。 【26】，康德第247號、第612 號、第714號、第1001號、 第1372號、第1569號、第1769 號、第2084號、第2123號、 第2342號、第3139號。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1942年3月派為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經濟部分科會臨時委員。 1945年2月任經濟部參事官，給7級俸，派在大臣官房辦事。戰後國民政府在長春成立東北行營，派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擔任經濟委員會委員，與吳金川等人協助收集相關資料，歷時2個月。		
9	李永清 (1934年12月20日改姓山本)	臺灣 新竹		臺灣高等學校教員檢定合格	第三期 (1934年10月畢業)	1934年11月在外交部宣化司辦事，為外交部屬官。 1939年任外務局事務官，派在政務處辦事，薦任三等。後派在滿洲國外務局政務處大連辦事處服務。		【6】 【26】，康德第508號、第616號、第1592號。
10	吳昌禮	臺灣 臺北		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 (1934.3)	第三期 (1934年10月畢業)	1934年10月就職於奉天市國光戒煙所。 1935年為民政部技士，派在衛生司辦事，委任四等，給7級俸。同年派任戒煙所技士，在奉天戒煙所辦事，給8級俸。 1937年12月1日登錄為滿洲國醫師。 1939年為衛生技術廠技士，委任三等，給6級俸。 1940年委任二等。同年任厚生研究所技佐，薦任三等。該年6月任省理事官，派在興安西省民生廳辦事。9月任興安各省技佐，派在興安西省警務廳辦事，薦任六等，給15級俸。 1942年任興安西省民生廳保健科長。 1944年3月陞薦任二等，8月任公立醫院醫官，10級俸，派在吉林省立醫院辦事。同年任民生部技正，給9級俸，派在保健司防疫科辦事。 1945年1月，任厚生省研究所副研究官，給8級俸。	1952年起任臺北市建成區衛生所主任，一直到1970年。 1971年起任中山區衛生所所長。	【13】、【27】。 【15】(1970、1971)。 【26】，康德第282號、第430號、第910號、第1366號、第1369號、第1372號、第1834號、第2478號、第2940號、第3180號。 〈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至十年學籍簿〉、〈滿洲醫科大學檔案〉(瀋陽：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檔號：JD24, 54。
11	陳亭卿	臺灣 臺中	1914-?	臺灣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經濟科(1935)	第五期 (1936年6月畢業)	1935年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經濟科畢業後，由佐藤佐教授推薦給滿洲國民生部文教司長神尾式春(兩人係大學同學)後，一個星期內即到學務司普通教育科當雇員，而後考入大同學院。 1936年6月在民生部教育司任事務官。 1938年任民生部屬官給8級俸。10月以民生部高等官試補給7級俸，派在教育司辦事。 1939年陞薦任三等。 1943年3月陞薦任二等，4月任文教部事務官，派在學	1946年9月底回臺，12月到臺灣廣播電台任職，擔任文書日文部幹事。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因大批民眾進入電台播音，他以「煽動民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關了3個月。9月出獄後，進入華南銀行任職，後輾轉到各地分行，一直到退休。	【1】、【4】、【7】。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收於【8】。 【26】，康德第1326號、第1400號、第1646號、第2655號、第2872號。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務司辦事。12月任經濟部事務官，派在商務司辦事，給10級俸。		
12	王銘勳 (太田章博)	臺灣 嘉義	?-1959	臺灣臺南 高等工業 學校 (1937)	第八期 (1937年11 月畢業)	1938年12月以哈爾濱工業大學助教身份任民生部高等官試補，給7級俸。自1940年起潛心鑽研齒輪的基本理論及精密齒輪的設計與製造。 1943年被哈工大派往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精密機械研究所進修，從事齒輪形的研究。自1941至1943年止在日本機械工程學會的機關刊物《機械學會論文集》上，先後發表論文，受到日本學界的重視。 1945年5月回到哈爾濱繼續教學工作，講授機構學、製圖、材料力學、機械工學、機械設計等課，是中國第一位研究齒輪幾何學的專家。	日本敗戰後，他未回臺，曾任家庭教師和哈爾濱三中教員，1954年擔任中國醫科大學（原滿洲醫科大學改名）教務科教授兼數理系系主任，再調瀋陽工學院（即往後的東北工學院前身），1955年擔任東北工學院機械系系主任，但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的活動，被劃為右派分子，遂被送到農村勞改，1958年他的《變位齒輪》一書問世，得到很高的學術評價，但1959年他卻在勞改中過世，得年僅43歲。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徹底改正，恢復中國共產黨黨籍。	【3】、【19】、【24】。 【26】，康德第1400號、第1976號。
13	陳茂經	臺灣 彰化 (田中)		臺中師範 學校演習 科(1929)	第十期 (1939年6 月畢業)	滿洲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通過，1938年12月任法官檢察廳高等官試補，派在新京地方法院兼新京地方檢察廳新京區法院新京區檢察廳辦事。1939年5月畢業於大同學院。 1940年1月為候補審判官，派在遼陽地方法院兼遼陽區法院辦事，薦任三等。 1941年5月派為新京區檢察廳檢察官事務處理。 1942年先被派為候補審判官，任遼陽地方法院審判官兼遼陽地方法院審判官、奉天地方法院審判官、奉天區法院審判官，敘薦任三等。 1942年派充安東區法院審判官兼安東地方法院審判官、奉天高等法院安東分廳審判官。	回臺後在南投合作金庫任輔導室主任。	【1】、【10】。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許文華先生訪問紀錄〉，收於【8】。 【17】，1929年6月18日，夕刊，第4版。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謝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35】，頁195-210。 【26】，康德第1400號、第1494號、第1551號、第1723號、第2523號。
14	邱昌河	臺灣 臺中 (內埔)		日本山口 高等商業 學校	第十一期 (1939年12 月畢業)	1940年6月任稅務監督署高等官試補，兼任經濟部高等官試補，派在稅務司辦事。 1941年2月兼任經濟部高等官試補，派在稅務司工作。同年參加高等官考試（銓衡），第一次合格後，再通過行政科特別適格考試。任經濟部事務官，7月敘薦任三等，派在大臣官房辦事。	臺北市進出口公會常務理事、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理事。	【26】，康德第1835號、第2039號、第2161號、第2365號、第2551號、第2754號、第3069號。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1942年4月兼總務廳事務官，派在統計處辦事，11月任總務廳調查官，派在企畫處辦事。 1943年8月給12級俸，派在經濟部工務司辦事。 1944年9月任經濟部事務官，陞敘薦任二等。		
15 蔡西坤	臺灣 臺南	1915-?	日本京都 帝國大學 法學部	第十三期 (1941年11 月畢業)	畢業後被派到錦州省當警佐（僅次於警正）。一年後參加一年一度的登格考試（升等），因成績優良，乃升為事務官，調任錦州警務處任高級警佐，再派到經濟保安科（10個月）、特務科、高級特務科，而後升調到文教科當副科長，再升任文教科科長。一年多後，再調到動員科，主要辦理各種人員調動的事，一直到日本投降。	1946年6月回臺，一度任教於臺大法學院，參加國家考試及格後出任檢察官，後辭職為執業律師。	【2】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蔡西坤先生訪問紀錄〉，收於【35】，頁178-180。
16 許坤元	臺灣 臺北 (新店)	?-1945	臺北帝國 大學文政 學部政學 科(1941)	第十三期 (1941年11 月畢業)	大學畢業後即到新京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及格，乃入大同學院，1941年11月畢業後被派到龍江省林甸縣分署工作，一度調到經濟部任職，與徐水德同事。 日本投降後，在長春待機回臺時，因病在9月22日入滿洲電信電話醫院治療，但病況惡化，11月4日過世。由臺灣同鄉幫他買棺、做墓碑，11月5日在20幾個同鄉送葬下，埋在「長春市大房身商工會義墓地，十八排五十六號」。		【1】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徐水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8】。 徐水德，〈光復日記（民國34年8月9日）〉，收於【8】。
17 謝 報	臺灣 彰化 (二水)	1915-1997	臺北工業 學校畢 業、日本 大學法科 (1938)	第十四期 (1942年9 月畢業)	大同學院畢業後，先在衛生技術廠任高等官試補，後給5級俸，派在錦州省辦事，專管經濟事務。 1943年參加高等官（行政科）適格、登格考試通過，而在8月任省高等官試補，給4級俸，派在綏中縣政府經濟科當科長，為事務官，負責管理山海關的貨物進出。一年多後被派到奉天省政府經濟廳服務，主掌金融、統制經濟。後受命代理副廳長，處理所有事務。	1946年底回臺，經營報關行與管商，參與地方選舉數次都告失利，也曾到宜蘭教書，到新光人壽保險公司服務，最後終於在1973年選上國大代表，任期8年。	【26】，康德第2500號、第2677號。 《中國時報》，1998年7月30日，第18版。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丘慧君紀錄，〈謝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35】，頁195-210。
18 林永倉	臺灣 臺北 (瑞芳)	1921-	臺北工業 學校土木 科 (1939)、 滿洲國新 京工業大 學(1942)	第十四期 (1942年9 月畢業)	新京工業大學畢業前（1941年）即考取大同學院，畢業後入大同學院受訓一年，1942年9月畢業。後任衛生技術廠高等官試補、交通部高等官試補，給4級俸，派在牡丹江土木工程處辦事，專做蘇、滿國境之道路、橋樑工程，不久被派到東滿國境東寧附近之小地營工務所，和由阿城派來的供出工人，參加河東橋建設工程。 1945年8月9日蘇軍入侵後，乃照軍方指示率領200名供出工人撤退，走到穆陵時被蘇軍超前，雖被搶劫身上的財物，仍趕到牡丹江火車站，將工人送上火車，經哈爾濱回到新京，當天正好是日本宣布投降的一天。	1946年7月回臺，曾任教於私立開南高級工商學校土木科。 1953年入臺北市政府任工務局都市計畫科長，1955年升任課長。翌年轉任工務建築管理課技正。 1956年2月至11月兼代工務局局長。1958年任工務局局長。 1965-1969年改任技正，因任內敦化路曲直案被停職十多年，後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永倉先生訪問紀錄〉，收於【8】。 【13】（1953、1955、1956、1959、1965）。 【26】，康德第2500號。 【29】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判無罪乃得復職，調任內湖特定區開發處副處長，直到退休。	
19	蔡啟運	臺北 福州	?-1993	日本東京 帝國大學 農學士	第14期 (1942年9 月畢業)	1942年任衛生技術廠高等官試補、公立國民高等學校高等官試補，派在北安省立克山國民高等學校辦事，給4級俸。	未回臺，留在吉林2年，後任長春大學副校長、吉林省委員。1976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在臺灣同鄉會工作。1981年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吉林省主任委員。1983-1987年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三屆總部理事會常務理事。1987-1992年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	【2】，頁197。 【26】，康德第2500號。 【32】，頁147-148。 【33】，頁108-109、115。
20	溫錦堂	臺灣 苗栗	1916-?	臺中師範 學校畢業 (1935) 、日本法 政大學法 律學科 (1942)、 同校碩 士、博士 進修。	第十五期 (1943年7 月畢業)	大學畢業當年(1942年)滿洲國高等官採用考試及格，又考入大專院專攻私法學，成法學碩士。1943年7月大同學院畢業，歷任滿洲國高等官試補、法制處事務官主任。	戰後歷任臺北市立大同中學高中部訓導主任，新竹、臺中執業律師，新竹律師公會理、監事，臺北律師公會法令研究委員。	【2】、【28】。 【26】，康德第2498號。
21	王森井			東京日本 大學工科 電氣科	第十五期 (1943年7 月畢業)	1943年7月任滿洲國經濟部技佐，戰後一度任東北電業公司技術員。		【30】
22	李水清	臺灣 臺北		建國大學 第一期經 濟系	第十六期 (1943年10 月畢業)	1933年臺灣總督府普通文官考試及格。1939年1月考入滿洲建國大學，學程六年，是建大第一期唯一經濟系畢業生。依當時規定，建大生畢業後要入大同學院受訓，1943年10月結訓，為總務廳高等官試補、外交部高等官試補，給4級俸，派在調查司辦事。1943年轉入滿洲帝國協和會，遂到熱河承德的圍場縣工作。1945年6月上旬收到協和會中央本部來電即刻到新京，協助中央鍊成所訓練本年採用的新職員，故兼任中央鍊成所教導。端午節後回到圍場，一直到日本投降。	回臺後建國大學學歷不被承認，由於常在家中與建大後輩集會，受同學林慶雲(判5年)的牽連，被判決有期徒刑2年，罪名為「共同陰謀意圖以暴動之方法顛覆政府」。出獄後，經營士林紙業有成。	【17】，1938年3月7日，第4版，〈英才を救ひ上た 満足を感ずるだけ 關少佐謙遜の感想〉。 【26】，康德第2814號、第3150號。 【31】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民國39年度訴字第6號。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李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水清先生訪問紀錄），1994年5月3日於李宅，未刊稿。
23	黃山水	臺灣 臺南		臺南第二 中學、滿 洲國建國 大學第一 期	第十六期 (1943年10 月畢業)	1943年大同學院畢業後，即到協和會承德縣土板城青年訓練所任職。 1945年1月到協和會中央本部，後又到中央鍊成所協助訓練採用的新職員，故兼任中央鍊成所教導。日本投降後前往北平。	回臺後，參加在李水清家的同學、校友集會，1948年與李水清等建大生被捕，和李水清都以同樣的罪名被判刑2年，1952年1月他不服上訴，乃加重改判為3年，9月他再度上訴，改判4年。出獄後曾任新竹貨運臺南市主任，臺南長榮中學歷史教師。	【26】，康德第1181號。 【31】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民國39年度訴字第1號、民國41年度訴字第1號。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涂南山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24	蔡宗傑 (蔡誠 傑、蔡傑 川、芳澤 誠傑)			新竹中 學、建國 大學第二 期	第十七期 前期 (1944年9 月畢業)	1944年6月19日，任總務廳高等官試補，給四級俸。9月，辭官，後轉入滿洲帝國協和會。	戰後回臺，因二二八事件逃亡日本，定居神戶迄今。	【2】、【20】、【21】。 【26】，康德第1343號、第3006號、第3092號。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涂南山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頁11、28。
25	許進來			日本大學 農科	第十八期 (1945年7 月畢業)	曾在興農部工作。		【30】
26	周文進		1917.07.25- ?	臺北第一 中學校	第二部第 六期 (1937年 12月畢業)	後赴朝鮮平壤醫學專門學校就讀。	戰後回臺任陽明山結核防治所兼衛生院的醫師。	【34】
27	葉炳煌	臺灣 新竹 (湖 口)	1915.11.14 ~1976.02.2 0	新竹州立 中學校	第二部第 六期 (1937年 12月畢業)	1939年中央警察學校助教授，並任三江省地方學校教官。 1940年薦任三等，三江省警務廳警務科警正。 1942年黑河省警正。 1944年辭職。	戰後回臺，曾任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總幹事（會長為翁鈞）及臺灣省畜產公司業務科長等職，也曾在湖口鄉擔任農會理事。曾任新竹湖口鄉連續三屆的鄉長。後參選臺灣省議員，曾參選第二屆臨時省議會議員。在陳俊宏議員病逝後，依候補順序遞補為省議員，後再度參選並當選第三屆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	【1】、【26】、【30】。 湖口鄉志編輯委員會編，《湖口鄉志》（新竹：湖口鄉公所，1996），頁321-322。 〈省議員陳俊宏 腦溢血逝世〉，《聯合報》，1958年9月15日，第3版。 〈戰幕初啟談選壇大勢 彭瑞鷺意外獲提名 葉炳煌躍躍欲出馬 新竹縣長選局爆出冷門〉，《聯合報》，1960年1月28日，第4版。

	姓名 又名	籍貫	生卒年	畢業學校	大同學院 畢業期數	在滿洲的經歷	回臺後（或在中國） 的經歷	參考書目
28	陳東興	臺灣 南投 (竹 山)		臺中師範 學校演習 科(1929)	第二部第 七期 (1938年6 月畢業)	1935年欲入滿洲國陸軍士官學校就讀，但未成行。 1939年滿洲國高等文官考試及格，乃到新京治安部警務 司警察科任職，一度任錦州省警務處警正。其間以優異 的成績畢業於大同學院，又及格高等薦任文官適格考試。	戰後回臺，一說曾任警察局長， 一說任彰化縣秘書。	【1】、【10】。 【17】，1931年9月11日，第 3版，〈郡下學校職員異動〉。 【17】，1935年5月22日，第 8版，〈竹山ノ渡滿者多〉。 【17】，1939年5月7日，第 8版，〈竹山ノ高文ノパス〉。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徐 水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 【8】。 許丕樵（為陳東興在臺中師範 學校的同學）的證詞。
29	吳福興	臺灣 臺南		日本大阪 工業大學 專門部採 礦冶金科	新制第二 部第三期 (1941年4 月19日畢 業)	1934年到滿洲任實業部鑛業監督署技士，給6級俸。 1936年給4級俸。 1937年委任二等。 1939年改為產業部技士，派在工務司辦事。 1940年任產業部技佐，派在礦山司辦事，同年高等官適 格考試及特別適格登格考試通過。 1941年入大同學院新制第二部第三期。畢業後任經濟部 技佐。	回臺後曾任水泥公司協理。	〈許文華先生訪問紀錄〉，收 於【8】。 【30】 【26】，康德第264號、第590 號、第880號、第1600號、 第1804號、第1837號。 〈「外務省記錄」・昭和戰前 期・旅券資料〉（東京：日本外 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J.2,2,0,113~17，昭和8.4-9.3， 旅08.2022,235.554。



附註：為省篇幅，表格中以代碼表參考資料，對照如下：

- 【1】大同學院同窓會編，《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1942年版）。
- 【2】米沢久子編集，《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1998年版）。
- 【3】不著編人，《瀋陽文學院教育人物匯編》（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不詳），上冊。
-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
- 【5】中西利八編纂，《滿洲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89年重印本）。
- 【6】中西利八編纂，《滿華職員錄》。
- 【7】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文教部總務司編，《滿洲帝國文教關係職員錄》。
- 【8】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
- 【9】臺大同學會編，《臺大畢業同學錄》（臺北：該會，1952）。
- 【10】臺中師範學校編，《臺中師範學校職員生徒名刺交換會》（臺中：該會，1929）。
- 【11】臺北市政府編，《臺北市各機關股長以上人員通訊錄》（臺北：該府，1960）。
- 【12】臺北市政府編，《臺北市各機關職員錄》（臺北：該府，1959）。
- 【13】臺北市政府編，《臺北市各機關職員通訊錄》（臺北：該府，1953）。
- 【14】臺北市政府人事室編印，《臺北市政府機關職員通訊錄》（臺北：該府，1953、1955、1956、1959、1965年版）。
- 【15】臺北市政府編，《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員通訊錄》（臺北：該府，1964、1968、1970、1971年版）。
- 【16】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記念祝賀會編，《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臺北：該會，1926）。
- 【17】《臺灣日日新報》（1929-1939）。
- 【18】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編，《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會員錄》（臺北：該會，1956）。
- 【19】哈爾濱工科大学編，《哈爾濱工科大学一覽》（哈爾濱：該校，1940）。
- 【20】建國大學編，《建國大學一覽》（新京：該校，1941）。
- 【21】建國大學同窓會編，《建國大學同窓會名簿》（東京：該會，1988）。
- 【22】開南同窓會編，《會員名簿（昭和16年6月30日現在）》（臺北：該會，1941）。
- 【23】滿洲國教育史委員會編，《滿洲帝國文教年鑑》（東京：エムティ出版社，1992）。
- 【24】嘉義中學校同窓會編，《嘉義中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錄》13（1941年12月）。
- 【25】高橋勇八，《滿洲商工名鑑》（大連：大陸出版協會，1938）。
- 【26】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
- 【27】滿洲醫科大学編，《滿洲醫科大学一覽》（奉天：該校，1941）。
- 【28】劉恆奴，〈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者為中心〉，收於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臺北：該會，2004），頁587-638，「附錄一，1923-1943臺灣人通過日本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及格或具法曹同等資格者之名單」。
- 【29】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八·職官志·文職表篇·武職表篇》（南投：該會，1993），第2冊。
- 【30】〈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1946年1月28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31】李水清，〈東北八年回憶錄（1938年4月至1946年7月）〉，未刊稿。
- 【32】許雪姬訪問，吳美慧、曾金蘭紀錄，〈楊蘭洲先生口述訪問紀錄〉，頁143-160。
- 【33】臺盟史論編輯委員會編，《臺盟史論》（北京：臺海出版社，1997）。
- 【34】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55年度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1966）。
- 【3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

## 引用書目

- 〈「外務省記錄」·昭和戰前期·旅券史料〉, J,2,2,0,J13~7, 昭和 9.4-9.6, 旅 109,523.241,662。東京: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外務省記錄」·昭和戰前期·旅券資料〉, J,2,2,0,J13~17, 昭和 8.4~9.3, 旅 08.2022,235.554。東京: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1946年1月28日)〉。南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為呈請指定輪便接回東北臺胞由〉。南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至十年學籍簿〉, 《滿洲醫科大學檔案》, 檔號: JD24, 54。瀋陽: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檔號: 不詳。臺北: 司法院藏。
- 臺中廳長枝德二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 〈國籍喪失ニ関スル件〉(大正4年4月12日),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第2359冊。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中國時報》(1998)。
- 《國聲報》(1947)。
- 《臺灣日日新報》(1929-1939)。
- 《臺灣民報》295(1930)。
- 《臺灣總督府官報》639(1944年5月10日)。
- 「外國元首並皇族本邦訪問關係雜件 滿洲國ノ部, 溥儀皇帝御來朝ノ件」, 〈滿洲國皇帝陛下扈從官(昭和10年2月12日)〉, 檔號: L.1.3.0, 2-6-1。東京: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創辦董事會·董事簡介〉, 「財團法人明裕文化基金會」, 下載日期: 2012年8月3日, 網址: [http://www.mingyu.org.tw/mingyu1\\_5.asp](http://www.mingyu.org.tw/mingyu1_5.asp)。
- 李水清, 〈東北八年回憶錄(1938年4月至1946年7月)〉, 未刊稿。
- 國務院總務廳編, 《滿洲國政府公報》, 第1號~341號(大同), 第1~3268號(康德), 第23號~第3268號(1932-1945)。
-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 〈洪在明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1999年7月8日, 2000年4月10、28日、5月18日、6月8日, 2001年3月2日、4月27日, 於臺北市農安街洪宅。
-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 〈李水清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1994年5月3日, 於李宅。
-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紀錄, 〈洪智默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2000年6月18日, 於洪宅。
-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 〈涂南山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 黃富三、許雪姬訪問, 丘慧君紀錄, 〈林衡道、蔡啟恒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1992年12月7日, 於臺北市YMCA。
- 大同學院同窓會(編)  
1942 《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新京: 大同學院同窓會。
- 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  
1933 《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新京: 大同學院。

大阪毎日新聞社（編）

1941 《日本人名選・附滿支人名選》。大阪：大阪毎日新聞社。

山室信一

1998 〈植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満洲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收於ピーター・ドウス（Peter Duus）、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大東亜共栄圏」の思想と現実》，頁155-202。東京：青木書店。

文 斐（編）

2005 《我所知道的偽滿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不著編人

不詳 《瀋陽文學院教育人物匯編》，上冊。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1994 《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1997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檔案館（編）

2000 《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北京：中華書局。

中西利八（編纂）

1942 《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

1989 《滿洲人名辭典》。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

1993 《鄭孝胥日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

今村俊三等

1935 《滿洲國人傑紹介號》。東京：日支問題研究會。

內尾直昌（編）

1934 《滿洲國名士鑑・康德元年版》。東京：人事興信所。

尹 虎

2009 〈「滿洲国」における在滿朝鮮人指導方針と「民族協和」〉，《國際日本學論叢》6: 39-61。

丘樹屏

1998 《偽滿洲國十四年史話》。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古屋哲夫（編）

1992 《滿洲國人事法今年表：大同元年（1932）～康德二年（1935）》。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朱金元、陳祖恩

1988 《汪偽受審紀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米沢久子（編集）

1998 《大同学院同窓会名簿》。東京：大同学院同窓会。

佐藤定勝（編）

1937 《最新滿洲帝國大觀》。東京：誠文堂新光社。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

1990 《滿洲國史：分論·上冊》。長春：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遼寧編寫組(譯)

1988 《滿洲開發四十年史》。遼寧：東北淪陷十四年史遼寧編寫組。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編)

2010 《偽滿洲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松井孝也(編集)

1978 《滿州：日露戦争から建国・滅亡まで》。東京：毎日新聞社。

林ひふみ

2009 〈滿州国の台湾人と日本人，その戦後董清財，吉崎ヨシ夫婦の足跡〉，《明治大学教養論集》441: 1-38。

林 聲(主編)

1991 《九一八事變圖志》。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

武藤富男

1988 《私と滿州国》。東京：文芸春秋。

哈爾濱工科大学(編)

1940 《哈爾濱工科大学一覽》。哈爾濱：哈爾濱工科大学。

姜念東

1991 《偽滿洲國史》。大連：大連出版社。

建國大學(編)

1941 《建國大學一覽》。新京：建國大學。

建國大學同窓會(編)

1988 《建國大學同窓會名簿》。東京：建國大學同窓會。

柏崎才吉(編)

1941 《滿洲國現勢：康德八年版》。新京：滿洲國通信社。

柝倉正一

1942 《滿洲中央銀行十年史》。新京：滿洲中央銀行。

高橋勇八

1938 《滿洲商工名鑑》。大連：大陸出版協會。

國務院總務廳人事處人事科(編)

1943 《滿洲帝國文官制度概要》。新京：國務院總務廳人事處。

第三戰區金廈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編)

1947 《閩臺漢奸犯罪紀實》。廈門：江聲文化出版社。

許雪姬

2003 〈滿洲經驗與白色恐怖：「滿洲建大等案」的實與虛〉，收於許雪姬主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頁1-39。臺北：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2007 〈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 57-117。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丘慧君（紀錄）

1994 〈謝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195-210。臺北：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曾金蘭（紀錄）

1994 〈楊蘭洲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143-16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

1994 〈蔡西坤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161-193。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

2004 《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

1994 〈吳左金先生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95-12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

1994 〈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第5期）：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頁247-26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著）、杉本史子（譯）

2012 〈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人の中国での活動：満洲国と汪精衛政権にいたる人々を例として〉，《中国21（特集 台湾：走向世界、走向中国—政治経済秩序の編成と再編成）》36: 97-122。

湖口鄉志編輯委員會（編）

1996 《湖口鄉志》。新竹：湖口鄉公所。

創立五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委員會（編）

1986 《友情の架橋：海外同窓の記録》。東京：大同学院同窓會。

渡辺諒

1956 《大いなる流れ：満洲終戦実記》。東京：大いなる流れ刊行會。

満洲国史編纂刊行會（編）

1970 《満洲国史：上巻・總論》。東京：満蒙同胞援護會。

1971 《満洲国史：下巻・各論》。東京：満蒙同胞援護會。

開南同窓會（編）

1941 《會員名簿（昭和16年6月30日現在）》。臺北：開南同窓會。

解學詩

1995 《偽満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嘉義中學校同窓會（編）

1941 《嘉義中學校同窓會會報・附會員名錄》，第13號。

満洲國國務院文教部總務司（編）

1936 《満洲帝國文教關係職員錄》。新京：満洲國國務院文教部總務司。

滿洲國教育史委員會(編)

1992 《滿洲帝國文教年鑑》。東京:エムティ出版社。

滿洲醫科大學(編)

1941 《滿洲醫科大學一覽》。奉天:滿洲醫科大學。

臺大同學會(編)

1952 《臺大畢業同學錄》。臺北:臺大同學會。

臺中師範學校(編)

1929 《臺中師範學校職員生徒名刺交換會》。臺中:臺中師範學校職員生徒名刺交換會。

臺北市政府(編)

1959 《臺北市各機關職員錄》。臺北:臺北市政府。

1960 《臺北市各機關課股長以上人員通訊錄》。臺北:臺北市政府。

1964-1971 《臺北市各機關職員通訊錄》,1964、1968、1970、1971年版。臺北: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人事室(編印)

1953-1965 《臺北市政府機關職員通訊錄》,1953、1955、1956、1959、1965年版。臺北:臺北市政府。

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記念祝賀會(編)

1926 《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臺北: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記念祝賀會。

臺盟史論編輯委員會(編)

1997 《臺盟史論》。北京:臺海出版社。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93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八·職官志·文職表篇·武職表篇》,第2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

1966 《臺灣省醫師公會55年度會員名冊》。高雄:臺灣醫界社。

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編)

1956 《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會員錄》。臺北: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

劉 昕(編)

2003 《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第七卷·民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劉恆姣

2004 〈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者為中心〉,收於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頁587-638。臺北: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蔡雅祺

2010 《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臺北:國史館。

蔡慧玉

2007 〈日治臺灣的俸給令研究:明治建制、官制釋疑及臺灣基層行政〉,收於汪榮祖主編,《地方史研究集》,頁123-188。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

舉國社(編)

1934 《大滿洲帝國名鑑》。東京:舉國社。

## **Taiwanese Senior Officials in Manchukuo: The Case of Graduates from Tatung Academy**

Hsueh-chi Hsu

### **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932, Tatung Academy (大同學院) was like a training institute for officials of the puppet government “Manchukuo”(「滿洲國」). Only those who passed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for senior civil servants, as stipulated by the 1938 Decree for Civil Servants(文官令), could enrolled into Tatung Academy. The training period ranged from 6 to 12 months, followed by a year of internship.

Tatung Academy offered great attraction to Taiwanes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First,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ere scarcely available for local Taiwanese who suffered unfavorable treatment. On the contrary, Manchukuo as an “emerging state” was in desperate need of talents with jobs that promised high salaries. In its first phase of establishment, Tatung Academy recruited mainly Taiwanese and Korean graduates from Japanese universities and technical schools. From 1933 to 1945, there were 25 Taiwanese graduating from Tatung Academy. The majority of enrollees in the second phase were Manchurian and Han graduates from high school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seven years of this phase, there were four Taiwanese graduates. With the new system introduced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Academy took in mainly those who passed the promotion examination of senior civil servants and there was only one Taiwanese graduate. All 29 Taiwanese graduates eventually became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Manchukuo governme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being dead and another opting to stay in the Mainland, all the remaining 26 graduates returned to Taiwan. However, their former service in the puppet regime posed obstacles for their being qualified for national and local examinations and their becoming civil servan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orse still, their previous years of service were not counted. Despite the initial setback upon their return to Taiwan, the capability and competence of these graduates coupled with their “Manchurian experience” eventually earned them both opportunities and status in post-war Taiwan.

The academics had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Taiwanese involved in anti-Japanese organizations in Chongqing (重慶), showing little interest in these elites from Taiwan who had served in Manchukuo and their “Manchurian experience”. Comparatively, materials on the related history were also scar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Manchukuo Empire Official Gazette (《滿洲國政府公報》) and interview record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atung Academy and its changing role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ecree for Civil Servants in Manchukuo. Moreover, the reasons for the exodus of talents from Taiwan to Manchukuo, their experience, their retur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ir subsequent adaptations are also examined to shed light on this rather unique history of Taiwanese elites.

**Keywords:** Tatung Academy, Manchukuo, Taiwanese